

中國文化研究

通
訊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2021年第2期

总第18期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基地

主办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智库

顾问

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常江

主编

李浩

执行主编

张海青 赵杭

责任编辑

陈战峰 王早娟

刘晓宇 刘晓

吴红兵

封面题字

袁行霈

◆工作简讯

《黄帝祭文汇编简注》新书发行 /2

李浩教授图书捐赠仪式暨读者交流会在长安校区图书馆举办 /4

“陕西省秦岭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课题开题 /5

◆专家观点

杜甫北征与秦直道 /6

◆序跋与评论

摩石有成 /46

“大视野解读”新材料 /53

◆学术平台巡礼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64

◆学者风采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梁星亮 /67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杨洪 /69

◆新书推介

乐府通论 /71

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困境与解决之道 /72

《黄帝祭文汇编简注》新书发行

2021年4月3日，在陕西省黄陵县举行的“祭祀黄帝陵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学术论坛开幕式上，《黄帝祭文汇编简注》新书发行。陕西省副省长方光华，西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常江，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陕西省祭陵办主任、黄陵县委书记孟中华，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以及西北大学出版社代表共同为新书发行揭幕。

由李浩教授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帝祭文汇编简注》，是近年来黄帝祭文资料整理与研究的最新成果，收录了宋代以来的祭文

120余篇，以及有丰富内容的“附录”（包括《黄帝碑志、颂赞、诗歌（选录）》《黄帝传记（三篇）》《黄帝世系图表》《黄帝研究论文选辑》等）。它的出版发行，为黄帝文化研究、黄帝陵祭祀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为增进中华文化共同体认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了助益，也为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贡献了绵薄之力。

据李浩教授介绍，桥山黄帝祭祀连绵不绝，至迟从汉代开始，已有国君亲自前往或委托专人代表朝廷赴今天的黄陵县桥山祭祀黄帝，中间虽偶有衰废，但整体上绵延不绝、日新不已，留下了



《黄帝祭文汇编简注》新书发布揭幕



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介绍该书的编撰特色

诸多祭祀文章、碑石印刻等，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黄帝与黄帝陵祭祀发挥了号召华夏儿女、同仇敌忾、共创辉煌、赓续历史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每年均举行公祭仪式。

李浩说，祭祀文化除祭祀典礼中各种仪式的呈现外，祭文是最核心的要素，对历代黄帝祭文的整理研究，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的黄帝陵祭祀过程及内容，亦可透过祭文所述史实，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该书代表性祭文有明代朱元璋洪武四年祭文，还有 1937 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在桥山同祭祖先，毛泽东亲笔起草的著名祭文《祭黄帝陵文》等。

常江表示，作为一所具有 119 年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综合性大学，西北大学坚持“发扬民族精

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理念，始终与时俱进，始终守正创新，始终彰显出顽强的学术生命力和学科创造能力。文化研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现了一大批以高度文化自觉进行中华文化传承的学者。

《黄帝祭文汇编简注》一书集聚陕西省祭陵办、黄帝陵文化园区管委会、黄陵县与西北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及西北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单位之力，不仅系统搜集整理了历朝历代国家祭祀的祭文文献，兼及与黄帝相关的部分诗词颂赞、黄帝传记、黄帝世系及研究论文等文献资料的成果，而且配以黄陵现存的历代祭文碑实物图片及碑文拓片、黄陵景观图片，从而既印证了黄帝陵是历代国家祭祀的法定场所，也为保存绵延至今的黄帝陵祭祀传统、研究黄帝文化提供借鉴，以期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

李浩教授图书捐赠仪式 暨读者交流会在长安校区图书馆举办

4月14日下午,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图书捐赠仪式暨读者交流会在长安校区图书馆举办。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李振杰出席活动,我校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及相关院系的师生代表和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活动。

捐赠仪式上,李浩向陕西省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捐赠本人著述的28种53册精品图书,李振杰和学校图书馆负责人接受捐赠并向李浩颁发了收藏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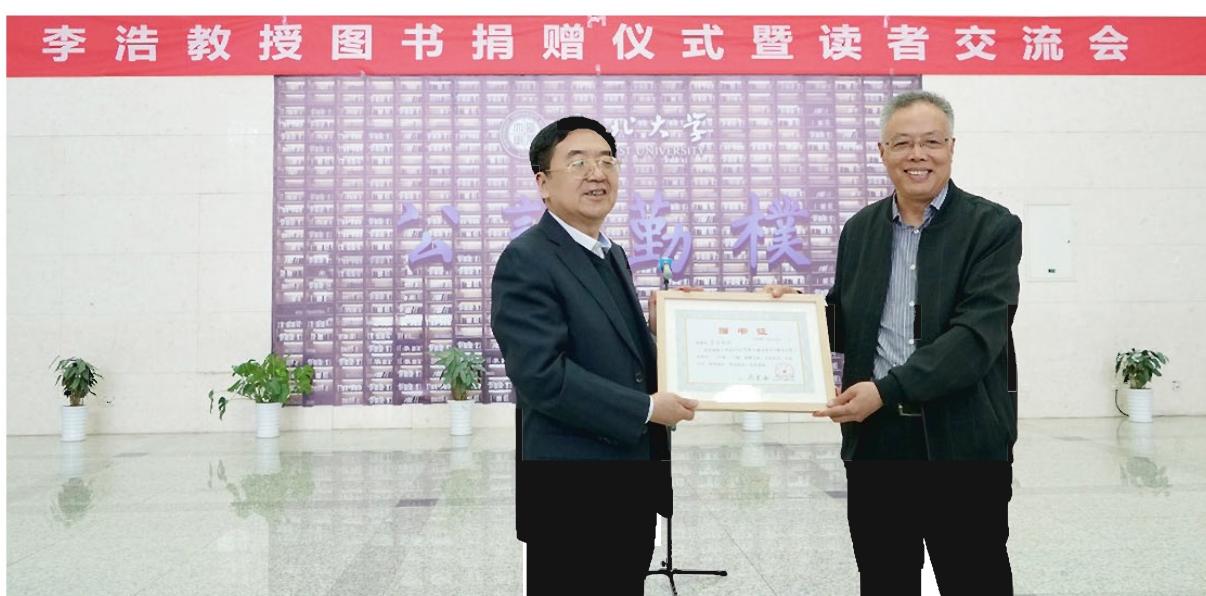
李振杰在讲话中表示,很高兴能参加本次赠书仪式,感谢李浩教授对省图的无私捐赠。他强调,李浩的研究极具价值,意义深远,期待今后与他及西北大学图书馆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

校图书馆负责人表示,李浩教授的捐赠是对

图书资源建设的倾情奉献,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薪火相承,丰富了我校图书馆“西大文库”的资源,给西大青年学子提供了更好的交流机会和读书氛围。

李浩在讲话中感谢学校的支持培养,他希望通过赠书的方式回馈学校和社会的文化建设,他呼吁更多学者和老师通过捐赠书籍等方式支持图书馆的文化建设。

在读者交流环节,李浩以“读书、预流与学术传统——从新见《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的整理研究说起”为题,与现场师生分享了他关于《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整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就经典阅读方法、散文写作、学术传统等问题与读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互动。



李浩教授向陕西省图书馆捐赠本人著述的28种53册精品图书

“陕西省秦岭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课题开题

2021年4月23日，由我中心承担的省发改委项目“陕西省秦岭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在中心会议室举行开题会议。

项目副组长赵杭在会上强调了研究秦岭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意义，陈艳向课题组成员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概况、实施方案以及工作安排。其他课题组成员就具体工作流程、工作难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目前，项目组各成员正在依照整合完成的计划推进课题工作，预计于6月中旬完成《秦岭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2021—2025）》建议稿。中心一直重视发挥高校智库功能，与政府积极合作，为地方发展建言献策。近年来，政府牵头的课题研究多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的形式，此次投标并顺利中标，也为

中心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参与政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对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作出重要批示指示。生态环境是秦岭开发保护之本，随着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题的彻底解决，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秦岭历史文化资源成为了当前需要攻坚的重大课题，就此陕西省发改委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陕西省秦岭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课题。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积极响应，最终顺利中标，并与发改委签订了研究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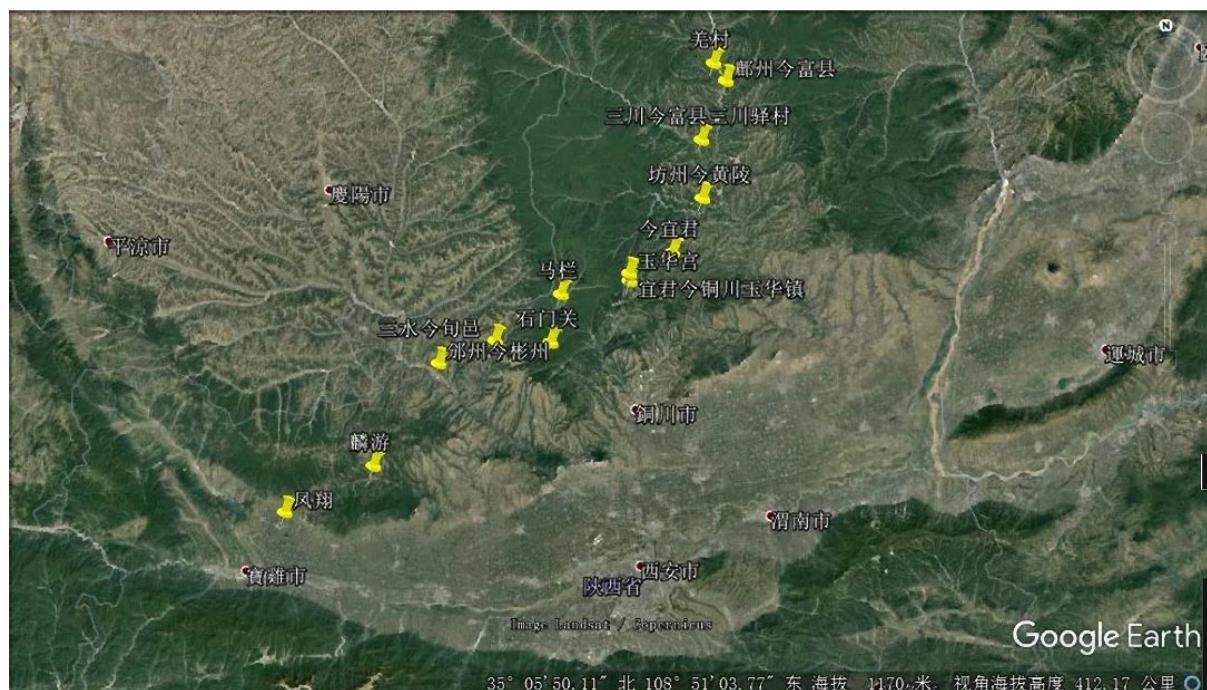


杜甫北征与秦直道

邓小军

摘要:秦直道自云阳北抵九原，千八百里，是中国古代唯一沿山脊线修建的国防交通大道，线型顺直，路基坚实，路面宽阔平坦，被誉为“中国高速公路之祖”，媲美长城。本文首次提出：杜甫《北征》诗有三道确实证据：“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共同确证杜甫北征经行秦直道三水县石门关—宜君县马栏段。杜甫《北征》细致叙述亲身经行秦直道石门关—马栏段，包含关于唐代秦直道自然、人文之情况的大量信息，为诗史增加了深厚的历史地理内容，是自司马迁《史记》以后关于秦直道的稀有的、最直观的、路段信息最翔实的珍贵文献。

关键词:杜甫 北征 秦直道 石门关 马栏



杜甫北征示意图(卫星地图)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自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逃出，穿越叛军战线，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凤翔(今陕西凤翔)行在。五月授左拾遗，疏救宰相房琯，触怒肃宗，诏付三司推问，欲杀杜

甫，因宰相张镐等相救获免。闰八月一日，当唐军即将反攻长安时，杜甫奉肃宗墨制放归鄜州(今陕西富县)省家。墨制用于公务，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此时放归省家，是对杜甫变相的放

逐。肃宗出于非法抢夺皇位而来的阴暗心理,先是镇压永王璘水军^①,现在开始全面贬逐清流士大夫^②,之后则有囚死上皇唐玄宗^③。

杜甫《北征》诗历叙放归鄜州省家全程所历所感,包含隐忧肃宗政治,关注平叛战争,自然、时代,个人、家庭,气象万千,全诗 700 字,超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杜甫诗史第一杰作。其中,“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是批评肃宗拒谏斥贤。“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与“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是指出上皇失去贵妃与失去君位,业已为其政治失道付出沉重代价亦即赎罪,希冀肃宗能够善待上皇。杜甫早已预见到肃宗政治全部恶果。

《北征》叙述自邠州(今陕西彬州市)朝东北至玉华宫(今陕西铜川市玉华宫遗址)之间一段行程,奇情壮彩,惊心动魄,篇幅长达 140 字,超过《石壕吏》120 字。其中包含杜甫经行^④三水(今陕西旬邑)县地域,行走秦直道。

秦直道自云阳县(今陕西淳化县)北抵九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千八百里,是中国古代唯一沿山脊线修建的国防交通大道,线型顺直,路基坚实,路面宽阔平坦,被誉为“中国高速公路之祖,媲美长城”。

杜甫北征经行秦直道南段中的自三水县石门关北至宜君县马栏段,里程约 33 公里(72 唐里)。《北征》邠州 - 三水 - 玉华宫段 28 句 140

字,其中 18 句 90 字,系叙述其中石门关 - 马栏秦直道行程。

《北征》包含杜甫经行三水县地域、行走秦直道等历史地理问题,及乘马、借马、随从马夫等背后的历史制度问题,从来无人涉及。其中路遇猛虎等细节,亦无确解。今试作郑笺,以期解决这些问题,并对《北征》邠州 - 玉华宫段作出笺证。

一、杜甫北征经行地点里程

杜甫北征经行地点,本文行文使用唐代地名,在第一次出现时及必要时,括注今地名。

杜甫北征经行里程,本文行文以唐里为主;少数里程,标明清里、公里,并换算为唐里。个别里程,清里、唐里之区别,在本文范围内意义不大,为避免烦琐,未再换算。

1. 凤翔行在(今陕西凤翔县)- 麟游县(今陕西麟游县)

杜甫《宋本杜工部集》卷二《北征》:

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

杜甫《宋本杜工部集》卷二《九成宫》:

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曾官凭风回,岌岌土囊口。……我行属时危,仰望嗟叹久。天王守太白,驻马更搔首。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

^① 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 年第 5 期;《李白与永王璘“谋主”李台卿-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笺证》,《北京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李白从璘之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学报》2015 年第 5 期。

^② 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兼论唐代的制敕与墨制》上、下篇,《杜甫研究学刊》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第 2 期。

^③ 邓小军:《杜甫〈北征〉补笺》,《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

^④ 经行:唐人习用语。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暮年且喜经行近。”唐杜环著有《经行记》。

《凤翔府·麟游县》：

西南至府一百六十里。

九成宫，在县治西一里，即隋文帝所置仁寿宫。每岁避暑，春往冬还。

2. 麟游县 - 邠州（今陕西彬州市）

杜甫《北征》：

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

杜甫《宋本杜工部集》卷二《徒步归行》：

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途经邠州作。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

清王朝爵修、孙星衍纂乾隆四十九年《直隶邠州志》卷二《州县故治今治二·今邠州城》：

西南至麟游县治一百四十里。

3. 邠州 - 三水县（今陕西旬邑县）

杜甫北征经过玉华宫，作有《玉华宫》诗，自邠州朝东北至玉华宫，三水县地域是必经之地。

杜甫《北征》：

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邠州·三水县》：

西南至州六十里。

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二《地理·道里》：

西四十里为邠州界，又二十里至州。^②

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一《沿革·历代建置》：

唐代宗元年，吐蕃焚掠，移县治于职田镇。

唐元和四年，复移其古治。

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二《地理·镇市》：

职田镇。在邑东北三十里。唐时以为县，至宪宗复移旧治。

2014 年《旬邑县志》第一编《行政建置志》第一章《位置与建制》第三节《县治变迁》：

隋时三水县治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开皇三年(583)移于今邠州东三里，新平故郡城”，新平故郡城即今彬县县城，大业初移治今县城东的红土坡下。唐朝三水县治先承隋治，在今红土坡下。代宗时因城被焚，移治职田镇，宪宗时(元和四年或元和十二年)又从职田镇移回红土坡下。宋、金时三水县治仍在红土坡下。元时三水县并入淳化县。明成化十三年(1477)复置三水县，复县后勘地修城，新辟县治在今县城，历清、中华民国，再未变迁。^③

案：第一，“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确证杜甫北征自邠州北上经行三水县地域。

第二，由康熙《三水县志》、2014 年《旬邑县志》可知，唐代宗以前包括肃宗至德二载(757)时之三水县治，即今旬邑县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 40-41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京畿道》标三水县位于今旬邑北(盖指职田)，误。

4. 三水县 - 宜君县（今陕西铜川市玉华宫遗址南 4 里，当即铜川市玉华镇）- 玉华宫（今陕西铜川市玉华宫遗址）

①清王朝爵修、孙星衍纂：乾隆四十九年《直隶邠州志》，卷二，叶 6b。

②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二，叶 4b。

③旬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旬邑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年，第 60-61 页。

杜甫《北征》邠州 - 三水县 - 宜君县 - 玉华宫部分：

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鴟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杜甫《宋本杜工部集》卷二《玉华宫》：

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

案：根据杜甫《北征》、《玉华宫》诗意，参证古今地理文献及今地图，可知《北征》自“邠郊入地底”至“残害为异物”一段 28 句 140 字诗，是叙述自邠州经三水县经石门关、马栏至宜君县、玉华宫一段行程。可以称之为《北征》邠州 - 三水 - 玉华宫段。

《北征》写出了自马栏至宜君县行程，并未写到达宜君县、玉华宫，杜甫另有《玉华宫》诗标明到达玉华宫，而自宜君县至玉华宫只有 4 里，因此，本文称自“邠郊入地底”至“残害为异物”一段诗为《北征》邠州 - 三水 - 玉华宫段，较称之为《北征》邠州 - 三水 - 宜君县段，更为醒目。

其中“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叙述离开邠州北上三水，回头俯瞰邠州、泾水之情景。可以

理解为邠州境地行程，亦可以理解为自邠州进入三水县境地之行程。因为自邠州进入三水县境地，驿道曲折不过 20 清里，今地图直线距离不过 7.7 公里。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坊州(中部)·宜君县》：

贞观……二十年，置玉华宫，仍于官所置宜君县，属雍州。永徽二年，与官同废。龙朔三年，坊州刺史窦师伦奏，再置玉华宫，在县北四里。

南唐末北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关西道十一·坊州·宜君县》：

玉华宫，在县西四十里。

北宋末期欧阳忞《舆地广记》卷十四《陕西永兴军路下·坊州·宜君县》：

有玉华宫，在今县北。

清查遵纂辑、沈华订正雍正十年《宜君县志·山川》：

玉华山，县西南四十里，唐太宗建玉华宫，以此名山。^①

《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清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九《鄜州直隶州·宜君故城》：

按宜君县移治，诸志未详何时，但《元和志》云玉华宫在县北四里，《寰宇记》云官在县西四十里，移治当在五代时也。

秦凤岗《宜君城的变迁》：

五代中的后梁时，宜君县城从玉华宫旧址迁到了战略要地——龟山顶上，也就是今天的宜君城之所在。^②

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长安城

^①清雍正查遵纂辑、沈华订正：雍正十年《宜君县志》，叶 3b。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宜君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宜君文史》第 1 集，1984 年，第 230 页。

附近的驿道和驿馆》:

唐代的宜君县治，在玉华宫以南4里的地方。现在的宜君县城系明代改筑，而宜君县治从玉华宫之南迁往现在宜君县城附近的时间，据说大致在五代或北宋初年。^①

1992年《宜君县志》第十三编《城乡建设志》第一章《城镇建设》第一节《城廓变迁》：

唐武德七年(624)，在太宗李世民的离宫之一的玉华宫(今属铜川市郊区)附近新设宜君县治。五代时期，梁出于军事需要，将宜君县城从玉华宫附近迁至交通战略要道—龟山，即县城现址。^②

案：第一，由《元和郡县图志》、南唐末北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清顺治《宜君县志》、嘉庆《大清一统志》，可知唐宜君县治位于玉华宫南4里，清(五代至今)宜君县城西南44里；玉华宫位于唐宜君县治北4里，清宜君县城西南40里。

秦凤岗《宜君城的变迁》、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长安城附近的驿道和驿馆》、1992年《宜君县志》，亦足资参考。

第二，北宋末期欧阳忞《舆地广记》“玉华宫，

在今县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40-41唐开元二十九年(741)《京畿道》标宜君位于今宜君，均误。

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之二《地理·铺舍》：

东路有万寿铺、职田铺、北坡铺，达马栏以通榆林。^③

清查遵纂辑、沈华订正雍正十年《宜君县志·疆域》：

西南……至三水县二百四十里。^④

清查遵纂辑、沈华订正雍正十年《宜君县志·镇堡》：

马栏镇，县西(南)一百二十里。^⑤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於义修、沈青峰撰雍正《(雍正)陕西通志》卷十七《关梁二·鄜州·宜君县》：

马栏镇。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通庆阳界，有防兵。

案：第一，康熙《三水县志》所述“职田铺、北坡铺，达马栏以通榆林”，是指自三水县朝东北经职田至宜君县之马栏^⑥，可以通向宜君、中部(今黄陵)、鄜州、延安府、榆林府。此即是清三水 -

^①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1页。

^②宜君县志编纂委员会：《宜君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368页。

^③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二，叶3a。

^④清雍正查遵纂辑、沈华订正：雍正十年《宜君县志》，叶1b。

^⑤清雍正查遵纂辑、沈华订正：雍正十年《宜君县志》，叶3a。

^⑥关于马栏。清、民国马栏属宜君县，民国二十六年(1937)5月28日属中共陕北根据地新正县，民国三十八年(1949)9月属栒邑(今旬邑)县。(旬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旬邑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21-26页。)今旬邑县有两马栏，一为旬邑东北之马栏镇；一为马栏镇东北之马栏村，本文所述马栏均指此马栏村。马栏地名起于何时，至迟清初已经有之。马栏地名当得自于当地之马栏山、马栏河。古沎水亦名师水，今名三水河，三水河上游河段名马栏河，发源于今旬邑县、黄陵县子午岭马栏山区北部，曲折南流，转西南流向，经马栏、旬邑、彬县程家川南侧入泾河。

职田 - 马栏 - 宜君驿道。

第二,由雍正《宜君县志》,可知清宜君县朝西南至马栏 120 清里,清宜君县经马栏朝西南至三水县 240 清里,马栏位于三水、清宜君县之间,三水 - 马栏、马栏 - 清宜君县,里程均为 120 清里。

清三水县 - 玉华宫 - 清宜君县驿道里程可表示为:

三水县 —— 职田 —— 马栏 —— 唐宜君县 —— 玉华宫 —— 清宜君县
120 清里 76 清里 4 里 40 清里
(152 唐里) (80 唐里)

第三,清三水 - 职田 - 马栏驿道,并非唐代驿道。唐代三水 - 玉华宫驿道路线,为自三水朝东至石门关,自石门关朝北至马栏,自马栏朝东至唐宜君县,自宜君县朝北至玉华宫。其中石门关 - 马栏一段,系秦直道。

唐三水县 - 宜君县 - 玉华宫驿道里程可表示为:

三水县 —— 石门关 —— 马栏 —— 宜君县 —— 玉华宫
60 清里 57 清里 76 清里 4 里
(76 唐里) (72 唐里) (80 唐里)
(33 公里)

考详下文《三水 - 石门关 - 马栏道与三水 - 职田 - 马栏道里程、路况之比较》。

5. 宜君县 - 坊州(今陕西黄陵县)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坊州(中部)·宜君县》:

东北至州一百里。

6. 坊州 - 三川县(今陕西富县南三川驿村)

- 郏州(今陕西富县)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坊州(中部)》:

北至鄜州一百五十里。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鄜州(洛交)·三川县》:

东北至州六十里。

案:由《元和郡县图志》可知,坊州 - 三川 90 里,三川 - 郏州 60 里。

7. 郏州 - 羌村(今陕西富县西北大申号村)

杜甫《北征》: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杜甫《宋本杜工部集》卷二《羌村三首》其一: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於义修、沈青峰撰雍正《陕西通志》卷七十三《古迹二》:

杜甫草堂在鄜州南六十里,杜甫避难寓此,即三川也。又州西北三十里羌村,有杜窟。壁上诗甚多。(《延安府志》)

1994 年《富县志·文化志》第五章《文物古迹》第二节《古迹》—《古遗址·名人驻地遗址·羌村》:

即今岔口乡大申号村。唐天宝十五年(756),诗人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带妻子儿女驻鄜州城北 30 里羌村,著有《羌村三首》等。^①

小结

第一,由上相关杜诗及相关历代方志,可知

^①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425 页。

杜甫北征全程经行地点,是自凤翔行在(今陕西凤翔县)朝东北方向,经过凤翔府所属麟游县(今陕西麟游县)、邠州(今陕西彬州市)、邠州所属三水县(今陕西旬邑县)、三水县石门关(今旬邑石门关)、坊州所属宜君县马栏(今旬邑马栏)、宜君县(今陕西铜川市玉华宫遗址南4里,当即玉华镇)、玉华宫、坊州(今陕西黄陵县)、鄜州所属三川县(今陕西富县南三川驿村)、鄜州(今陕西富县),共计经历8个府州县,始抵达鄜州所属羌村(今陕西富县西北大申号村)。

第二,杜甫北征全程道里,自凤翔至麟游县160里,麟游至邠州140里,邠州至三水县60里,三水县至石门关76里(60清里)、石门关至马栏72里(33公里;57清里),马栏至宜君县80里(76清里),宜君县至玉华宫4里,宜君至坊州100里,坊州至三川县90里,三川县至鄜州60里,鄜州至羌村30里。共计自凤翔至羌村全程约868里。杜甫《羌村三首》其一“归客千里至”,取成数言之也。

第三,杜甫北征8个府州县之间7个行程段,距离最长之段,为自三水县至宜君县228里一段。杜甫北征自三水县至宜君县228里一段行程,尤其其中自三水县石门关至宜君县马栏秦直道72里一段行程,从来无人道及。

杜甫北征所经地理区域,是从关中平原凤翔,朝东北方向,经陕北黄土高原南缘麟游、陕北黄土高原南部邠州、三水、宜君,然后向北,经陕北黄土高原中部坊州、鄜州,到达羌村。所

见地貌景观,子午岭^①众山脉由北而南走向,南端直贯三水、宜君等县,海拔高达1880余米至1700余米,崇山峻岭,黄土原梁,丰草长林,此起彼伏。

自三水至宜君所行道路,须横跨子午岭南端高山深壑,除自三水东之石门关北至马栏一段为秦直道,系车马大路外,只有人行驮运驿道,曲折陡峭,崎岖难行。自宜君北上鄜州,则是长安至延州(今延安)的官马大道,路况好走。故《北征》诗写沿途所见所感,叙述凤翔-麟游-邠州行程,仅用“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8句40字诗,而叙述邠州-三水-宜君、玉华宫行程,乃用28句140字诗,浓墨重彩,蔚为壮观。并以单独诗篇《玉华宫》,叙述达玉华宫;《羌村三首》,叙述到达羌村。至于宜君-坊州-三川-鄜州一大段延州道行程,则完全从略。

二、杜甫北征行走秦直道石门关-马栏段

1. 唐代三水至马栏可能有两条通道

1.1 三水-石门关-马栏道,其中石门关-马栏为秦直道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邠州·三水县》:

石门山。在县东五十里,峰岩相对,望之似门。

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四《艺文·七言律》唐郑谷《春过郿邑诗》:

^①《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唐颜师古注:“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子午岭,计南北直相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中国山脉东西走向居多,子午岭山脉系南北走向,故特以子午为名。

百里花封俗化淳，名踪盛迹半犹存。谷坪白虎藏岩洞，地涌金泉过石门。旧县城颓三水镇，故家树老五林村。残碑堕落夫人冢，苔藓年年长泪痕。^①

2000 年《彬县志·交通邮电志》第一章《交通》第一节《古道》：

唐耀州、三水道 唐代曾辟从耀州经石门关到三水，西去至宁州的驿道。由关中去庆阳的商贩多行此道。^②

案：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三水县》“石门山，在县东五十里”，唐郑谷《春过郿邑诗》“地涌金泉过石门”，可知唐时有自三水东至石门关道路，此即是 2000 年《彬县志》所述“唐代曾辟从耀州经石门关到三水的驿道”，唐耀州 – 三水驿道。

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二《地理·道里》：

东南一百五十里至耀州。^③

《明史》卷四十二《地理志》三《邠州·三水》：

东南有石门山。东有三水河，一名汎水，西南流入泾水。东南有石门巡检司。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於义修、沈青峰撰雍正《陕西通志》卷十七《三水县》：

石门关。在县东六十里石门山。……两山夹立，势极高峻，为西北要害。亦名尧门，汉更名石关，为邠之镇，以汉武于此立关而名也。（《州志》）关外为耀州、淳化、宜君、同官四州县交错之地。

明置石门关，甃石为城，设巡司，又于岭上筑岸门，重关之险。今巡司裁，雍正元年，设把总汛。（县册）

2014 年《旬邑县志》第二十二编《军事》第二章《军事要地》第二节《关隘·石门关》：

位于县城东 30 千米的石门山中，四面环山，地势险峻，海拔 1885 米，为旬邑县最高点。旬（邑）耀（州）公路逾关而行，是耀旬往来之咽喉。古为秦直道关口，汉武帝时设关，明置巡检司，清为汛（千总、把总、外委统帅的绿营兵驻守的地方）。^④

《大唐六典》卷三度支郎中员外郎条：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

《大唐六典》卷五驾部郎中员外郎条：

凡三十里一驿。

案：第一，三水 – 石门关 – 耀州 150 里，其中三水 – 石门关 60 里，由唐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凡三十里一驿”，可知唐代石门关当设有馆驿。

第二，由《明史》、清雍正《陕西通志》、2000 年《旬邑县志》，可知石门关为军事要地，汉时设关，明设巡司，清设把总汛，可以作为唐代石门关设馆驿，甚至设关之旁证。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

《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

^①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四，叶 63a-b。

^②彬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彬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68 页。

^③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二，叶 4b。

^④旬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旬邑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年，第 650 页。

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

《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徐君峰《秦直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第二章《从历史迷雾中走出的秦直道》—《史念海开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先河》：

1975年，为了完成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出于防修反修战备需要而交办的编写兵要地理志的任务，史念海在浩瀚的史海中，对有关秦直道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搜集与梳理。^①

司马迁曾随汉武帝刘彻亲身走过秦直道，虽然在《史记》中留下了修筑秦直道的最直接记载，但所有记载只谈及了秦直道及其南北的起讫点。至今能够见到的最早明确记述秦直道经行地点的历史文献，也是经常被学者引用的只有两条。一条见于唐元和年间撰著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是子午岭南段的秦直道：“秦故道在（襄乐）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史念海认为唐襄乐县就是甘肃省宁县襄乐镇（现在叫湘乐镇）。一条见于唐

贞观年间编纂的《括地志》，记载了子午岭北段的秦直道：“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原书已佚失，这条记述见于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征引。史念海认为唐华池县是现在甘肃省华池县的东华池村。^②

史念海在对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后，在军区参谋和几位专家的陪同下，野外考察一个多月，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进行勾勒，寻找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秦直道。尽管司马迁并未说出可供今人借鉴的途经之地的具体地名，庆幸的是他论述了途经之地“堑山堙谷”的地理环境。史念海以司马迁的论述为依据，在实地踏查的基础上，发表了长达两万馀字的《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③

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三《子午岭南段上的直道及其遗迹》（1975年）：

直道只有一条，是由云阳县的甘泉山通到九原郡。^④

直道由（云阳）林光宫开始，就进到甘泉山。甘泉山为子午岭南端的一个支岭，也就是说直道离林光宫后就进到子午岭，循岭北行。^⑤

旬邑石门关的同志见告：据当地人们记忆，距今数十年前，由石门关至马栏河一段子午岭的主脉风子梁，正是关中棉花向北运输的道路。每当运花季节，梁上路旁的灌木枝上，粘花带絮，一

^①徐君峰：《秦直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47页。

^②徐君峰：《秦直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47页。

^③徐君峰：《秦直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48页。

^④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35页。原载《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又载《文物》1975年第10期，又载孙闻博编《秦直道研究论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

^⑤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41页。

路皆白。解放战争前,石门关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为储粮仓库所在地,风子梁更成为转运粮草的大路。这些事实都说明,直道在秦始皇修筑以后,历代还曾断断续续加以使用,因而遗迹也得以保留。^①

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第一章《考古发掘、调查简报、论文·旬邑县秦直道调查钻探简报》(2014年):

旬邑县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北部,东接铜川耀州区,北依甘肃正宁,南傍淳化,西临彬县。全县总面积1811平方公里。……全县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最高点位石门关,海拔1885米,平均海拔960—1350米。本县西部山地属于子午岭南端及其余脉。^②

一、旬邑县秦直道概况

秦直道在旬邑县境内大致为南北走向,基本沿山梁分布。……山势起伏较大,视野开阔,秦直道在该段有一定起伏。

在旬邑县境内,秦直道南于前蝎子掌接淳化县秦直道,向北,下盘头坡,越七里川,经大草沟、庙沟、石门关、碾子院东、前陡坡,越马栏河谷,至两女寨(自两女寨至黑麻湾,秦直道在甘肃省正宁县境内)折向东北,沿子午岭平坦宽阔的山脊,经黑麻湾、破山子、离灵关、景家台与黄陵县秦直道相连,境内全长约90公里。……路面一般宽10—20米。^③

二、旬邑县秦直道的基本走向

(二)石门关至旬邑、耀州交界处

该段秦直道长约17公里。

此段道路较为曲折,但大致向东北方向延伸。^④

(三)旬邑、耀州区交界处至马栏

该段秦直道长约16公里。

总体沿北偏西方向延伸,途中弯度不大,相对较直。^⑤

案:第一,由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1975年)所述“旬邑石门关的同志见告:据当地人们记忆,距今数十年前,由石门关至马栏河一段子午岭的主脉风子梁,正是关中棉花向北运输的道路。每当运花季节,梁上路旁的灌木枝上,粘花带絮,一路皆白”,可知秦直道石门关—马栏段,直到民国时,畅通无阻,唐时畅通无阻,毫无问题。

第二,据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秦直道石门关至马栏里程约33公里。

1.2 三水—职田—马栏道

如前所述,由清康熙《三水县志》、雍正《宜君县志》,可知清代三水—职田—马栏—玉华宫—清宜君县之间,有驿道相通。清三水—马栏驿道里程为120清里。

由清康熙《三水县志》(详下文《除不经过县城的秦直道外,三水自古不通车路》所引)、1992

^①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42页。

^②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90页。

^③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90—91页。

^④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92—93页。

^⑤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93页。

年《宜君县志》，可知此驿道系人行驮运驿道，自古不能通车。

唐代是否有三水 - 职田 - 马栏道，文献无征，可能有之，假定有之。

2. 三水 - 石门关 - 马栏道与三水 - 职田 - 马栏道里程、路况之比较

2.1 里程比较

据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秦直道石门关至马栏里程约 33 公里。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七《户部》：

(康熙时) 度天下之土田。……以营造尺起度，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①

可知自康熙时期起，清制 1 里 =5 营造尺 × 360 步 =1800 营造尺。

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尺度》图版七〇《康熙牙尺 清》：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正面第一格(半寸)刻楷书“康熙御制”四字
……每寸长 3.2 厘米，一尺合 32 厘米。^②

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第十六章《清朝度量衡的兴衰》—《清朝的尺度》：

营造尺之长还可以从以下实物作一些佐证：
(1)“康熙御制”牙尺，全长 5 寸，一寸长 3.2 厘米。(2)“高宗纯皇帝钦定权度尺”(纯皇帝是乾隆谥号)一尺正合 32 厘米。(3)两支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商请国际权度局校订制造的营造

尺，一尺长 32 厘米。^③

丘光明《中国古代计量史·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节略)^④：

时代	年代(公元)	单位量值
		一尺合厘米数
唐	618—907	30.3
宋	960—1279	31.4
元	1206—1368	35
明	1368—1644	32
清	1616—1911	32

案：由上可知，自康熙时期起，清制 1 里 =32 厘米 × 1800 营造尺 =57,600 厘米 =576 米。

秦直道石门关 - 马栏段 33 公里 =33000 米 ÷ 576 米 = 清制 57.29 里。

《大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九：

《开元令》……

《令》云……诸度地，五尺为步，三百步为一里。

案：由上可知，唐制 1 里 =30.3 厘米 × 5 尺 × 300 步 =45,450 厘米 =454.5 米。

秦直道旬邑石门关 - 马栏段 33 公里 =33000 米 ÷ 454.5 米 = 唐制 72.6 里。

①清昆岗等编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光绪二十五年武英殿石印本，卷十七，叶 5a—叶 8a。

②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37 页。

③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 年，第 181 页。

④丘光明：《中国古代计量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年，第 191 页。

据清雍正《陕西通志》，三水 - 石门关 60 清里。

$$60 \text{ 清里} = 576 \text{ 米} \times 60 \text{ 清里} = 34,560 \text{ 米}$$

$$34,560 \text{ 米} \div 454.5 \text{ 米} = \text{唐制 76 里}$$

三水 - 石门关 76 唐里(60 清里)，石门关 - 马栏 72 唐里(33 公里；57 清里)，三水 - 石门关 - 马栏 148 唐里(117 清里)。

据清康熙《三水县志》、雍正《宜君县志》，三水 - 职田 - 马栏道 120 清里。

$$576 \text{ 米} \times 120 \text{ 清里} = 69,120 \text{ 米}$$

$$69,120 \text{ 米} \div 454.5 \text{ 米} = \text{唐制 152 里}$$

同在子午岭山脉崇山峻岭中，三水 - 石门关 - 马栏道约 148 唐里(117 清里)，比较三水 - 职田 - 马栏道 152 唐里(120 清里)，里程基本相等而稍短。

2.2 路况比较

更重要的是，石门关 - 马栏秦直道比三水 - 职田 - 马栏驮道具有无比优越性：秦直道线型端直，路面宽阔、平坦，坡道平缓，视野开阔，而不是像驮道那样路线曲折，路面狭窄、崎岖，坡道陡峭，视野受限。毫无疑问，在唐代，三水至马栏即使有不止一条道路，石门关 - 马栏秦直道是行人最佳选择。

3. 杜甫行走秦直道之确证：“石戴古车辙”

3.1《北征》：“石戴古车辙”

杜甫《北征》：

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

案：第一，《北征》“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二句，是叙述离开邠州北上回头俯瞰邠州，即将取道三水县地，前往玉华宫，接着就写出“石戴古车辙”，可知“石戴古车辙”是记叙三水上所见

路面景观。

第二，“石戴古车辙”，诗言行走在古道上，古道是岩石路面，岩石路面上留有古时候的车辙印迹。

3.2 秦直道重要功能是并排通行多辆辎重车辆，考古发掘发现秦直道黄土路段坚硬路面上碾压所形成之车辙沟深达 11 厘米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

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辌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

案：《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三十七年辒辌车自九原从直道至咸阳，是史言秦直道早已全线通车。

《史记》八十八《蒙恬列传》：

始皇二十六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

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徐君峰《秦直道考察行纪》第一章《秦直道的前世今生》—《秦直道的修筑以及意义》：

一石等于二十七市斤。三十万大军(三百日)粮食消耗高达五百四十万斛，换算下来仅基本口粮即为一亿四千五百八十万斤，这还不包括其他军用物资。

辎重车辆的载重量，文献记载不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朗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墨子·鲁问》：“说须臾刻二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王子今在《秦汉名

物丛考·流马方囊》中认为：“诸子书中语有时重论效能，不免夸张，未可以为实证。从《九章算术·均输》中关于‘均输粟’‘均赋粟’的算题所提供的情况看，汉代运粮车的载重标准一般为 25 斛。”那么运粮需二十一万六七辆辎重车辆。^①

案：由《史记·蒙恬列传》秦始二十六年“乃使蒙恬将三十万北逐戎狄”，“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及徐君峰《秦直道考察行纪》所考可知，秦直道重要功能是通行辎重车辆，自秦都咸阳向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县南）、九原三十万大军输送军用物资，一年仅输送粮食即达数百万斛，通行辎重车达数十万辆，秦时辎重车每辆载重量达数百斤以上。

清顾耿臣修、任于嶠纂康熙五年《鄜州志》卷一《古迹·圣人条》：

从山岭修成大路，可并行二三两车，遇险阻则转折蜿蜒通去，自西塞外来，经庆阳入鄜境，至西安嵯峨山而尽。不知何代，为何而修，嶠意始皇三十三年使蒙恬除直道，由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或即此也。^②

兰草《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见闻录》（1991 年）：

1962 年夏初，我受命参加一个考察队，赴子午岭考察陕、甘边界。

我站起来爬向（富县）望火楼最高点。远远眺

望，天那！这哪里像路！这简直像个足球场绵延远去。^③

我丈量了足有 50 米宽的直道垭口。最少可并排行驶 15 辆大汽车。^④

我站在（富县）“车路梁”的最高点，向北眺望一眼看不到边。这一段秦直道最宽、最平坦。路面没有生长树木。远远望去，真像一条绿色的巨蟒，仰卧在莽莽森林里。比现代飞机场跑道还宽畅。假如眼下真有一架飞机，保证能降落下来，也能顺利起飞。^⑤

案：清康熙《鄜州志》“从山岭修成大路，可并行二三两车”，兰草《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见闻录》“我丈量了足有 50 米宽的直道垭口。最少可并排行驶 15 辆大汽车”，“我站在‘车路梁’的最高点，向北眺望”，“比现代飞机场跑道还宽畅”，皆表明秦直道最重要的特征一是路面宽阔平坦，可以并排行驶多辆车，二是直道多行走在山脊线上。

“车路梁”之小地名，仅 3 个字，是走车辆的道，是山脊线上的道，两个特征，兼而有之。

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第一章《考古发掘、调查简报、论文·陕西富县秦直道考古取得突破性成果》（2009 年）：

二、秦直道研究回顾

2006 年至 2008 年，考古队相继对陕西成阳、延安和甘肃庆阳三地区九个县的直道进行了

^①徐君峰：《秦直道考察行纪》，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3 页。

^②清顾耿臣修：康熙五年《鄜州志》卷一，叶 8b。

^③兰草：《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见闻录》，《传记文学》1991 年第 6 期，第 107 页。

^④兰草：《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见闻录》，《传记文学》1991 年第 6 期，第 108 页。

^⑤兰草：《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见闻录》，《传记文学》1991 年第 6 期，第 109 页。

考古调查，并对陕西富县车路梁和黄陵南桂花两个地点进行了考古钻探和试掘（见图10），主要收获有：

南桂花位于黄陵县的子午岭主脉上……整个路基的上部、中部和东部均为夯土构筑，质地坚硬，色呈灰黄，上部夯层厚8~10厘米，下部厚12~16厘米。不少夯土中还夹有直径20~30厘米的礓石，以加强路基的强度。^①

三、2009年考古发掘

富县桦沟口段秦直道位于陕甘交界处，是自南而北下子午岭支脉后过葫芦河前的一段，呈西北—东南走向。发掘中心区地理坐标：北纬36°04' 14"，东经108° 41' 03"，海拔1205米。发掘共开5米×5米探方68个，探沟9条，发掘面积约2050平方米。^②

（一）《主要遗迹》

地层关系较单纯，大部分地点分为三层。第一层为耕土或植被层（扰动层），厚15~30厘米；第二层为自然堆积层，厚25~60厘米；第三层为路土碾压层，一般厚15~5厘米。再下即为生土层。^③

1. 路面、车辙

路面车辙呈放射状分布。下方有11~13道车辙辙梁，分布宽度约24米。随着上坡向前，路面变窄，车辙辙梁合并减少。至中心区的咽喉处，

车辙仅有6~7道，分布宽度仅约10米。

车辙间的辙梁系经过车轮反复碾压、挤压形成。大多数辙梁剖面略呈梯形，个别的呈半圆弧形。一般上部宽20~45厘米，下部宽30~55厘米，高（也即辙沟深）4~11厘米。^④

从成组或对称的车辙印判断，当时的车辆轮距有三种，即110厘米、130厘米和140厘米。

重要的是，多处路面上叠压有秦代和西汉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见图29），两处路面上还出土了铜镞和铜币，为道路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据。^⑤

（三）时代判断

总之，发掘出土的所有证据都支持这样一种判断：桦沟口段直道及其附属建筑，始建于秦代，沿用至西汉晚期或两汉之间，废弃。其中，直道下层路面的时代约为秦代和西汉早期，上层路面的时代约为西汉中期和晚期。^⑥

案：由张在明等《陕西富县秦直道考古取得突破性成果》所述秦直道黄陵南桂花段“整个路基”“为夯土构筑，质地坚硬，色呈灰黄，上部夯层厚8~10厘米，下部厚12~16厘米。不少夯土中还夹有直径20~30厘米的礓石，以加强路基的强度”，秦直道富县桦沟口段“路土碾压层厚15~35厘米”，“有11~13道车辙辙梁，分布宽度约24米”，“辙沟深4~11厘米”，足见秦直道

^①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6~47页。

^②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8页。

^③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8页。

^④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9页。

^⑤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2页。

^⑥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2页。

黄土路段路基坚实，路面可以并排行驶多辆车，尤足见秦时直道上行驶之车辆多为辎重车辆，故在秦直道坚硬路面上碾压所形成之车辙沟，深达 11 厘米。

3.3 秦直道包括三水段多沿子午岭山脊线连续而行，路面系松软的砂岩、风化石，辎重车辆能留下车辙沟痕迹，“石戴古车辙”是杜甫行走秦直道之确证

王开《“秦直道”新探》(1986 年)：
(秦直道)位于山脊、贯通南北，连接陕北黄土高原、长“千八百里”(汉里)。^①

为了编写《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的需要，陕西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有关地区(市)县的编史人员，于 1986 年 6 月中旬至 7 月下旬，并在此后多次对画家靳之林认定的路线进行了重点考察，所见所闻如下。^②

由石门关西侧沿子午岭主脉北行，经碾子院、前陡坡、卧牛石、老爷庙、大店至马栏河，这一段山岭统称“凤子梁”(又名枫树梁)。^③

秦直道能沿子午岭山脊连续而行，这与子午岭的山系构造有关。子午岭并非只有一条主脉，而是支脉蔓延，南北行走，东西并列。山脊宽阔平坦，无坚石，均为松软的砂岩构造，开凿较易。
……正因为子午岭是风化石或土山，与秦岭绝不

相同，才出现了一条千余里长的“沿脊线”路一直道。^④

王学理《咸阳帝都记》第六章《以首都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第二节《内史通天下的大道》六《直道》：

子午岭主脉及其支脉呈南北走向，系风化石和砂岩结构，顶部大多平坦宽阔，筑路工程与视野条件极佳。直道作为一种“沿脊线”，其弯道半径不少于 40 米，最大坡度也在 10% 以下，现存路基宽度 30~55 米。^⑤

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第一章《考古发掘、调查简报、论文·陕西富县秦直道考古取得突破性成果》—《秦直道简况》(2009 年)：

与常规道路沿河谷选线不同，秦直道的设计者巧妙地利用了陕甘交界处的子午岭及黄土高原特有的地形，建成了中国古代唯一沿山脊和高地选线的国家级交通大道。修成的直道线形顺直，弯道很大，道路标准很高，被誉为“中国高速公路之祖”。^⑥

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第一章《考古发掘、调查简报、论文·旬邑县秦直道调查钻探简报》(2014 年)：

一、旬邑县秦直道概况

^①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古代交通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733 页。原载《陕西交通史志通讯》1986 年第 5 期，又载《西北史地》1987 年第 2 期，增订稿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 年第 1 期，又载孙闻博编《秦直道研究论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年。

^②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古代交通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735 页。

^③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古代交通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736 页。

^④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古代交通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746 页。

^⑤王学理著，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咸阳帝都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 年，第 360 页。

^⑥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年，第 44 页。

秦直道在旬邑县境内大致为南北走向，基本沿山梁分布。^①

(二)石门关至旬邑、耀州交界处

子午岭主脉在此蜿蜒，而秦直道则沿山脊延伸。^②

案：第一，由张在明等《旬邑县秦直道调查钻探简报》，可知秦直道旬邑石门关以北段，多沿子午岭主脉山脊线延伸。

第二，由王开《“秦直道”新探》“秦直道能沿子午岭山脊连续而行”，是因为“子午岭山脉顶部均为松软的砂岩构造”，“是风化石或土山”，“开凿较易”，王学理《咸阳帝都记》“子午岭主脉及其支脉呈南北走向，系风化石和砂岩结构，顶部大多平坦宽阔，筑路工程与视野条件极佳”，可知秦直道子午岭山脊路面多系松软的砂岩、风化石，辎重车辆能留下车辙沟痕迹；《北征》：“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是写离开邠州北上三水县，接着写出“石戴古车辙”，确证了杜甫行走三水县地域秦直道，亦即秦直道石门关-马栏段。

4. 除不经过县城的秦直道外，三水自古不通车路，杜甫北征三水段未走秦直道的可能性完全排除

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四《艺文·议》林逢泰《请停缓续派粮草议》：

查得十四年续派粮草，先奉文拨运邻州，旋改运泾州。……本县设在万山之中，四面沟崖崎岖，自古无车辆可通。肩挑背负，所运几何？^③

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四《艺文·议》林逢泰《请改征草束及免车辆议》：

盖本县僻处山陬，沟崖崎岖，自古不通车路，并无车辆。^④

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康熙纂十六年《三水县志》卷四《艺文·议》林逢泰《再请改征草束免车辆议》：

至于派车七十九辆，因山沟崎岖，自古不通车路，业已折夫若干名、驴若干头。^⑤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於义修、沈青峰撰雍正《陕西通志》撰《陕西通志》卷五十三《名宦四·令长·国朝》

林逢泰，晋江人，举人，康熙八年，由陇西令调三水。厘奸剔弊，志在澄清，邑文庙、公署久圮，逢泰即捐俸修复。城垣仓库，次第整理。及王辅臣之变，训练乡勇，修饬城守，邑赖以全。至免荒粮，豁逃丁，及改征、折色、房税、地税诸议，尤见其实心爱民云。

1992年《宜君县志》第九编《交通邮电志》第一章《交通》第二节《道路》—《驮道》：

到清末、民国时，宜君境内已形成的主要人行驮运干道有20条，由县城和五里镇、七里镇

^①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90页。

^②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93页。

^③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四，叶43a-叶44a。

^④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四，叶44b。

^⑤清林逢泰重修、文倬天纂：康熙十六年《三水县志》卷四，叶46b。

(又名店头,今属黄陵县)、偏桥、焦坪四镇辐射向本县马栏(今属旬邑)……等周围的城镇。^①

案:第一,由康熙初期三水知县林逢泰《请停缓续派粮草议》“本县设在万山之中,四面沟崖崎岖,自古无车辆可通”,《请改征草束及免车辆议》“本县僻处山陬,沟崖崎岖,自古不通车路,并无车辆”,《再请改征草束免车辆议》“因山沟崎岖,自古不通车路”,可知除不经过县城的秦直道外,三水自古不通车路,只有人行驮运小道,不能通车,包括三水 - 职田 - 马栏道。

第二,由 1992 年《宜君县志》,可知清三水 - 职田 - 马栏 - 玉华宫 - 清宜君县驿道系人行驮运驿道,不能通车,可以作为林逢泰所述三水“自古不通车路”之旁证。

第三,除不经过县城的秦直道外,三水自古不通车路,因此,杜甫《北征》三水县部分“石戴古车辙”,确证杜甫北征乃是行走石门关 - 马栏秦直道。此段行程,全程为三水 - 石门关 - 马栏 - 宜君 - 玉华宫。

第四,杜甫北征三水段未走秦直道的可能性,至此完全排除。

《唐律疏议》卷十《职制律·乘驿马枉道》: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

疏议曰:乘驿马者,皆依驿路而向前驿。若不依驿路别行,是为“枉道”。

案:由《唐律疏议》可知,判断一条道路是否是唐代官方驿道的标准,是该道路是否为当地馆驿人员领送往来官员经行的道路。

至德二载闰八月,杜甫是在三水馆驿马夫领送下,经行三水 - 石门关 - 马栏道,可知三水 - 石门关 - 马栏道才是唐代官方驿道。唐代即使有三水 - 职田 - 马栏道,也不是官方驿道。

唐代三水 - 宜君官方驿道路线,系三水 - 石门关 - 马栏 - 宜君。

杜甫北征示意图



行文至此,杜甫北征经行秦直道石门关 - 马栏段考察既明,杜甫北征全程经行地点、路线,可用示意图表示如下。

三、杜甫北征乘马、借马、仆夫

1. 杜甫北征自凤翔至邠州是乘马,所乘马是借马,须自邠州归还凤翔

杜甫《九成宫》:

天王守太白,驻马更搔首。

杜甫《北征》:

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

《大唐六典》卷三度支郎中员外郎条: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

《唐六典》卷五驾部郎中员外郎条:

^①宜君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君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 年,第 242-243 页。

凡三十里一驿。

《唐会要》卷六十一卷六十一《御史台中·馆驿》：

长安四年五月二日。乘传人使，事闲缓每日不得过四驿。

1993年《麟游县志》第八编《交通邮电》第一章《交通》第二节《道路》—《古道路》(三)《唐路》：

麟游古代道路遗址有迹可考者，始于隋唐。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诏改仁寿宫为九成宫，太宗、高宗相继游幸。……当时又开辟了麟凤古道，此路为唐王驻跸九成宫时，驻凤官员与南来使节奏对朝贺必经之道。其具体路线由凤翔县城过老君顶、姚家沟、亢家河，上十八岭坡，经石门关、三官庙、良舍至麟游。^①

杜甫《宋本杜工部集》卷二《徒步归行》：

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途经邠州作。

明公壮年值时危，经济实藉英雄姿。国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祸乱非公谁。凤翔千官且饱饭，衣马不复能轻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

《九家集注杜诗》卷三：

赵云：李特进，嗣业也。

《钱注杜诗》卷二略引《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二载：

二月戊子，幸凤翔郡。……众上议，大举收复两京，尽括公私马以助军。

《旧唐书》卷一百九《李嗣业传》：

李嗣业，京兆高陵人也。身长七尺，壮勇绝

伦。天宝初，随募至安西，频经战斗，于时诸军初用陌刀，咸推嗣业为能。每为队头，所向必陷。……天宝七载，安西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军，专征勃律……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上……贼不虞汉军暴至，遂大溃……遂长驱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斩藤桥，以兵三千人戍。于是拂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归国家，款塞朝献，嗣业之功也。由此拜右威卫将军。十载，又从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以跳荡加特进，兼本官。……与大食战，仙芝大败。……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仙芝表其功，加骠骑左金吾大将军。

及禄山反，两京陷，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嗣业自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至凤翔谒见，上曰：“今日得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遂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常犄角为先锋将。嗣业每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至德二年九月，嗣业从广平王收复京城……嗣业时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为前军，朔方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王思礼为后军。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八《李嗣业传》：

嗣业忠毅忧国，不计居产，有宛马十疋，前后赏赐，皆上于官以助军云。

案：第一，由杜甫《九成宫》“驻马更搔首”，《北征》“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可知至德二载闰八月一日杜甫北征启程，自凤翔经麟游至邠州，是乘马行路，并非“徒步归行”。

第二，杜甫自凤翔至邠州乘马，马从何来？参

^①①麟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麟游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8页。

证《徒步归行》“白头拾遗徒步归”、“须公枥上追风飘”，杜甫自邠州至鄜州羌村所乘骑之马，是在邠州所借李嗣业之军马，可知杜甫自凤翔至邠州所乘骑之马，是在凤翔所借之马^①。但借马乘骑只能至邠州，自邠州归还。至德二载二月以来“尽括公私马以助军”，馆驿已经无马，在邠州系借军马，在凤翔当亦是借军马，但是借马行程日期更为短暂。

第三，据 1993 年《麟游县志》，唐太宗时已有凤翔 - 麟游道，乃是太宗驻跸九成宫时驻凤官员、南来使节必经之大道，自麟游至邠州则已不远。故杜甫自凤翔经麟游至邠州行程，当为独自骑马行路，不需馆驿人员步行领送（参见下文），以行程节省时间，及时归还凤翔所借之马。杜甫自凤翔经麟游至邠州 300 里，以马一日行 70 里计，当在第 4 天（八月四日）抵达邠州。

第四，杜甫《徒步归行》题下注“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途经邠州作”，记述途经邠州向李嗣业借马事，当为自注，非他人所能拟；诗言“凤翔千官且饱饭，衣马不复能轻肥”，亦当为人在邠州语气，非在凤翔语气；可知至德二载八月初，特进、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李嗣业驻节邠州。盖邠州历来为长安西北军事重镇，现在乃是凤翔行在北方屏障故也。

第五，杜甫至邠州即已归还在凤翔所借之马，已经无马，故“赠李特进”诗得曰“徒步归行”。说明无马，以便借马。

第六，杜甫在邠州借得李嗣业军马，得乘骑此马直至鄜州北羌村矣。

2. 杜甫在邠州如何归还凤翔之马

至德二载二月以来“尽括公私马以助军”，馆驿已经无马，在凤翔所借马当为军马，借期短暂，须自邠州归还凤翔，如何归还？此点亦关系到杜甫至羌村如何归还在邠州所借之军马，以及唐代制度驿马及领送人员之运作方式。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八《唐摹杂帖·李邕·光八郎帖行书十行》：

光八郎记室：劳借马，甚堪骑，悚息。濮王少若问，还报驿上安置，得不示之。

岳珂曰：右唐人摹北海太守赠秘书监李邕字？和光八郎帖真迹一卷。明皇之子琚，封于光，太宗之曾孙峤，袭于濮。唐世重郎，称在至尊，犹或名之，故虽帝子之贵，弗为渎也。邕以宗室在属籍，致迎劳，通假借，亲亲之谊，为有加焉。

案：第一，李邕从光王处借马乘骑回家后，将马交付与自家附近馆驿安排，使马归还光王处。此种由馆驿安排归还借马，本是唐代馆驿运作功能之一。

第二，由此可知，杜甫在邠州归还在凤翔所借之马，当是通过邠州、麟游馆驿人员接力乘骑，归还凤翔。

3. 杜甫自邠州至宜君随行之仆夫，系沿途各州县及中间站馆驿所派出之驿丁或马夫，接力担任步行领送任务

杜甫《北征》邠州 - 宜君县部分：

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

左拾遗二人，从八品上。

^①借马本是唐人生活常事。《宋本杜工部集》卷十六《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二首》其一：“峡内归田客，江边借马骑。”明王嗣奭撰《杜臆》卷九：“借马，借驿马也。”清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七：“驿乃白帝城之驿。草堂，瀼西草堂也。”

《大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郎中》条：

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原注：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都亭七十五足，诸道之第一等减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为差，第四减十二，第五减六，第六减四。其马官给。……凡马三名给丁一人。凡驿皆给钱以资之，什物并皆为市。凡乘驿者，在京于门下给券，在外于留守及诸军、州给券。）

《唐律疏议》卷十《职制律·增乘驿马者》条：

疏议曰：依《公式令》，给驿，职事三品以上若王四匹，四品及国公以上三匹，五品及爵三品以上二匹，散官、前官，各递减职事官一匹，余官爵及无品人各一匹。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诸应给传送》条：

疏议曰：应给传送，依《厩牧令》，官爵一品给马八匹，嗣王、郡王及二品以上，给马六匹，三品以下，各有等差。

《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诸私度关者》条：

疏议曰：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

唐杜佑《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乡官》条：

三十里置一驿，（原注：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各有将，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原注：自至德之后，民贫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

案：第一，《唐律疏议》所述“给驿”（“驿乘”），是指馆驿为执行公务往返经过之官员提供驿乘

之马（或驴、车、船等）。“给传”（“传送”、“传乘”），是指馆驿为官员省亲往返经过或官员因公家人随行往返经过提供传乘之马（或驴、车、船等）。

第二，唐制：馆驿根据往返经过官员所持符券给驿乘之马，根据往返经过官员所持递牒给传乘之马；官品高低不同，所给驿乘或传乘之马匹之数，各有等差；与此同时，为往返经过官员提供负责道路领送之驿丁或马夫（通常为步行，但到达前方馆驿后，可以乘所领送之马返回原出发馆驿，详见下文），并提供食宿、饲马（“凡驿皆给钱以资之，什物并皆为市”，“以待行李”）。

第三，杜甫为朝廷现任职官左拾遗，奉墨制回鄜州省亲，按唐代制度，持有递牒，经行沿途馆驿得给传乘一马，提供负责步行领送之驿丁或马夫，并提供食宿、饲马。现在“尽括公私马以助军”，馆驿已经无马，但是杜甫自己有借来的马，经行沿途馆驿，得仍照常提供负责步行领送之驿丁或马夫，并提供食宿、饲马。

第四，杜甫自邠州乘骑所借军马至鄜州北羌村，一路步行领送之驿丁或马夫，应当是由经行各州县馆驿及其下属中间站馆驿所接力派出者，而不是邠州李嗣业部下士兵或马夫。因为自邠州至鄜州羌村所历6个州县568里长途，只有沿途各州县馆驿及其下属中间站馆驿人员，才能熟悉当地地形、道路，沿途馆驿分段接力，步行领送人员才能胜任愉快，不致过劳。

第五，杜甫经行三水县—石门关—马栏—宜君县228里路段，系通过于子午岭南端深山老林，地形复杂，诸多艰难险阻，必须由三水、石门关、马栏等馆驿接力派出熟悉当地地形、道路之驿丁或马夫步行领送，始能到达目的地，否则或寸步难行。杜甫《北征》：“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

末。”是写自石门关北行至马栏河南岸，即将过马栏河，到达马栏。此处“我仆”，应即是由石门关驿为杜甫所派出之驿丁或马夫，担任步行领送至马栏之任务。

第六，杜甫从邠州李嗣业所借之马，当系军马、良马，故能一直乘骑到鄜州北羌村胜任愉快。此马完成任务返回邠州，当由鄜州、三川、坊州、宜君、三水沿途各地馆驿人员，接力乘骑归还邠州。

4. 关于唐代驿丁、驿卒、马夫

《大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郎中》条：
凡三十里一驿……凡马三名给丁一人。

《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九《典礼·广德二年南郊赦文》：

京兆府驿丁、屯丁。

《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牧守部》吕“元膺”条：

都亭驿卒五人、甘水驿卒三人。

《大唐六典》卷五《兵部尚书》：
天下诸军有健儿。

(日)荒川正晴《关于唐向西域输送布帛与客商的关系》：

观察敦煌的情况，可知传马由附属于县的传马坊管理，并且是官马。因此马子如果丢失了传马将被要求以新马抵充。而见诸度支指示中的脚夫，是指被差遣作为劳力的搬运人夫。如果以传马组成运输队，这些脚夫就是引导传马驴的马

子。在敦煌文书中，他们是作为“充行马子”、“行马子”出现的。^①

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

健儿是区别于一般百姓和卫士等其他兵士的基本身份，马子是他们成为健儿以后被派遣担任的职务，据此，可知天宝年间长行坊马子是由健儿充任的。^②

《全唐诗》卷三百三十八韩愈《天星送杨凝郎中贺正》：

天星牢落鸡喔咿，仆夫起餐车载脂。

《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一白居易《自秦望赴五松驿，马上偶睡，睡觉成吟》：

长途发已久，前馆行未至。体倦目已昏，瞌然遂成睡。右袂尚垂鞭，左手暂委辔。忽觉问仆夫，才行百步地。

案：第一，唐代馆驿隶属于兵部，驿长、驿丁、驿卒均为军事体制人员；唐代西域各府州县所属交通运输机构传马坊、长行坊的马子（马夫），往往是由健儿（士兵）充任，馆驿马夫亦可能由士兵充任。

第二，韩愈《天星送杨凝郎中贺正》、白居易《自秦望赴五松驿马上偶睡睡觉成吟》诗中之“仆夫”，当皆为馆驿之驿丁或马夫，与杜甫《北征》之“我仆”身份相同。

5. 关于唐代制度驿马及领送人员运作方式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法 Pel.Chin. 3714vo 《乾封二年至总章二年传马坊牒案卷》

^①(日)荒川正晴著，乐胜奎译，李少军校：《关于唐向西域输送布帛与客商的关系》，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3页。

^②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3页。

(15-7):

传马坊

马一十九匹去七月廿四日送殷大夫往伊州。
十匹程未满，在伊州坊未还。
九匹停经十二日，覆给使人甘元柬乘。
一匹回至内润北廿里致死，给得使人公验，
唐孝积。

八匹见到：

郭延客马赤次	张安都马赤次
解玄惠马者白次下	杨仁马忿(恩、聰)次
左孝积马忿次	唐满生马留次
张武通马留次	夏惠马赤驳次
牒上件马，差送使往伊州今还至，请定朕第。 谨牒。	
总章二年八月廿日行马子郭延客 前校尉杨迪 ^①	

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

马子，亦称马夫。许多文书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名称。……可知马子负责领马，并随马送使到目的地后再返回出发地。^②

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馆驿文书考

察之二》：

长行马和传马都由马坊派专人负责领送，领送者长行马文书中称“马子”或“马夫”，在传马坊文书中称“行马子”，马匹到达目的地后由马子(或行马子)乘回，或由使人复乘而回。^③

《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四百十七《二十二勘·站·站赤二》录元《(皇朝)经世大典》：

(至正十年)九月，中书兵部议，诸官府出使，事非急速，往往在路停止，及至上为兼程奔驛，遂将铺马损毙。今立程法，遍行遵守。

.....

一、依验札子应付正马外，其元来兀刺赤，已给马者听。无马者徒步引送，许乘正马以回，仍关前路照会。^④

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以源于蒙古语者为主)》上编《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3《兀刺赤》：

兀刺赤的职责分别为：

1. 牧马，也可称马夫；
2. 驾驿车，为车夫；
3. 用铺马迎送乘驿的人，自己或步行，或骑马，亦即马夫，或驿夫。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四怯薛》：“典车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4页。本件唐代敦煌文书首次介绍与录文，见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卢向前《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②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第33页。

^③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馆驿文书考察之二》，《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63页。

^④明解缙等修纂：《永乐大典》，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199页。

马者曰兀刺赤，莫伦赤。”^①

案：第一，唐代驿马及领送人员运作方式细节，今存传世唐代史料语焉不详，但是敦煌、吐鲁番唐写本传马坊、长行坊文书，可资参证。元《皇朝经世大典》所述站赤制度，其中相关之处，当是承袭自前代，亦可资参证。

第二，参证敦煌唐写本《乾封二年至总章二年传马坊牒案卷》所述“（沙州敦煌县）传马坊马一十九匹去七月廿四日送殷大夫往伊州，十匹程未满，在伊州坊未还，九匹停经十二日，覆给使人廿元柬乘（回），一匹回至内润北廿里致死”，“行马子郭延客”等“八匹见到”，以及元《经世大典》“（兀刺赤）无马者徒步引送，许乘正马以回”，可知唐代驿马及领送人员运作方式为：出发馆驿为往返经过官员提供驿乘之马，或传乘之马，同时，向往返经过官员提供负责道路领送之驿丁或马夫（马子），往往是步行领送，在到达前方馆驿后，由负责领送之驿丁或马夫将此马从前方到达馆驿乘骑回到出发馆驿，或由往返经过官员覆乘而回。其后行程，以此类推。

四、杜甫北征行程日期推算

唐制：陆行之程，马日行 70 里，步 50 里。唐代旅行的行程，制度规定里程只能是基本参照，州县实际间距会有所伸缩，此有所伸缩的州县间距，可能决定实际行程。

杜甫北征行程日期、起止地点，推算表示如下：

杜甫北征行程日期推算表		
时间：至德二载闰八月	起止地	里程
1 日 -2 日	凤翔 - 麟游	160 里
3 日 -4 日	麟游 - 邅州	140 里
5 日	邠州 - 三水	60 里
6 日 -7 日	三水 - 石门关	76 里
8 日	石门关 - 马栏	72 里
9 日 -10 日	马栏 - 宜君	80 里
	宜君 - 玉华宫	4 里
11-12 日	宜君 - 坊州	100 里
13-14 日	坊州 - 三川	90 里
15 日	三川 - 郼州	60 里
16 日	郿州 - 羌村	30 里
总计		868 里
备注：		
1. 宜君 - 坊州 100 里，已包含宜君 - 玉华宫 4 里。		
2. 凤翔 - 邻州行程，以独自骑马行路，一日行 70 里计。邻州 - 羌村行程，以沿途馆驿人员接力步行领送，一日步行 50 里计。		
3. 凡两日行程，起止地之间，有一止宿馆驿或止宿地，从略。其余行程中间，或有馆驿，亦从略。		
4. 按《北征》：“夜深经战场。”述自马栏至宜君。《羌村三首》其一：“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述到达羌村。可见此二日每日实际行程可能比推算日期行程更长，因此，北征完成时间有可能比推算时间更早两天。		

五、杜甫在邠州所借李嗣业军马，在唐军反攻长安之前已归还到李嗣业军中

杜甫《北征》：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九唐肃宗至德二载闰八月：

^①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以源于蒙古语者为主）》，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3-54 页。

戊辰(23 日),上劳飨诸将,遣攻长安,谓郭子仪曰:“事之济否,在此行也!”对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案:第一,参照唐制陆行之程,根据州县间距,推算杜甫北征行程日期,自凤翔至邠州 300 里,杜甫至德二载闰八月一日离开凤翔启程,以独自骑马行路,一日行 70 里计,当在第 4 天闰八月四日抵达邠州。

第二,自邠州至羌村 568 里,以闰八月五日启程,乘骑所借邠州军马,沿途馆驿人员接力步行领送,一日步行 50 里计,当在第 12 天闰八月十六日抵达羌村。

第三,自羌村至邠州 568 里,以闰八月十六日鄜州馆驿人员乘骑杜甫所借邠州军马启程(鄜州 - 羌村仅 30 里,可以当天往返),沿途馆驿人员接力乘骑,马一日行 120 里计,当在第 5 天闰八月二十日返抵邠州,归还借马。

第四,闰八月二十日杜甫所借军马归还至邠州,是在闰八月二十三日开始的凤翔唐军反攻长安之前 3 天,并不影响唐军反攻长安作战使用该军马。

第五,即使闰八月二十日邠州李嗣业军已经开赴凤翔,邠州至凤翔 300 里,以闰八月二十一日启程,马一日行 120 里计,杜甫所借军马由邠州馆驿人员或李嗣业军留守人员乘骑,亦可以在第 3 天闰八月二十三日凤翔行在肃宗劳飨诸将、遣攻长安之当天,归还到凤翔李嗣业军中。

第六,按《北征》述自马栏至宜君:“夜深经战场。”马栏 - 宜君距离为 80 里,似乎中途并未止

宿,故行路至于夜深。《羌村三首》其一述到达羌村:“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鄜州 - 羌村距离仅 30 里,不至于行路至于黄昏。可见此二日每日实际行程可能比推算日期行程更长,因此,北征完成时间有可能比上述推算时间更早两天,然则杜甫归还李嗣业军马的时间也就可能比上述推算时间更早两天。

六、《北征》自邠州至玉华宫段笺证

《北征》自“邠郊入地底”至“残害为异物”一段 28 句 140 字诗,可称为《北征》邠州 - 三水 - 玉华宫段,其中自“猛虎立我前”至“我仆犹木末”一段 18 句 90 字诗,系叙述自三水石门关 - 宜君马栏秦直道行程,可以称之为《北征》秦直道段。

“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

注释

“荡潏”:涌腾起伏。南朝齐张融《海赋》:“沙屿相接,洲岛相连,东西荡潏,如满于天。”唐陈子昂《感遇》诗之二十二:“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

笺证

2000 年《彬县志·概述》:

本县属陇东黄土高原塬梁沟壑区。塬面破碎,沟壑密布。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泾河自西北向东南斜贯中部,将全县分割成东北、西南两塬夹川道的地貌格局。两个塬体均向泾河下游倾斜。境内最高海拔 1501 米,最低海拔 715 米。^①

2000 年《彬县志·行政建置志》第四章《县城》第一节《古县城》:

^①彬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彬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 页。

邠县城 即隋豳州城，唐邠州治新平故城，宋邠州治新平故城，明清邠州治城，民国邠县城。隋开皇三年(583)在今泾河川道建豳州城。……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至今1407年。^①

2000年《彬县志·行政建置志》第四章《县城》第二节《今县城》：

位于县境中部，地处泾河川道南侧，城区川道宽2.8公里，城区总面积2.23平方公里。县城十字口海拔841.33米。^②

《彬县文史资料》第5辑《果乡彬州》第二节《彬县自然气候特点》—《自然条件》：

2. 地形地势 泾河川道区 地势由南北两侧向泾河倾斜……川道开阔平缓，可分为河漫滩，一级阶地、二级阶地。……一级阶地高出河床10—20米……二级阶地高出河床100—120米，地貌多呈掌状原梁。

3. 海拔高度 境内海拔715—1501米，高差786米，北原海拔900—1240米，南原海拔900—1501米，泾河川道海拔715—873米。^③

2019年3月31日谷歌卫星地图Google Earth：

彬州城中心海拔841米

彬州城北泾河河心海拔826米

彬州东北旬凤高速李家坡村海拔1102米^④

彬州东北旬凤高速旬邑庄里村海拔1165米

案：第一，杜甫走过的邠州城，即今彬州市

城，位于西北—东南流向的泾水(今泾河)川道南侧。《北征》“邠郊”，即泾河川道。川道深陷于东北、西南两塬夹缝之中。

第二，彬州城北泾河河心海拔826米，彬州城中心海拔841.33米，泾河川道北原海拔900—1240米，彬州东北旬凤高速李家坡村海拔1102米，彬州东北旬凤高速旬邑庄里村海拔1165米，杜甫从邠州往东北三水行走，置身泾河川道北原之上，俯瞰邠郊泾河川道，相对高差(广义落差)可以高达278米—339米左右，真是“邠郊入地底”矣。

第三，“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乃鬼斧神工之笔。

第四，杜甫诗史之史，包含精准之历史地理。“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

笺证

上二句“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是叙述离开邠州北上三水，接着“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二句及其下文，是叙述自石门关北上马栏秦直道上情景。因为下文中之“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是写自石门关北行至马栏河南岸，即将过马栏河，到达马栏。

中间略去自邠州行60里到达、止宿三水驿，次日自三水行76里到达、止宿石门关驿。此种省略写法，唐诗常见。例如李白《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写经平羌江赴嘉州，下句“夜发清溪向三峡”，写拂晓前从清溪

^①彬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彬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②彬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彬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③政协彬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彬县文史资料》第5辑《果乡彬州》，2000年，第6页。

^④旬凤高速公路，参照了百度地图。

驿出发,中间略去到达、止宿嘉州和自嘉州到达、止宿清溪驿。^①——交代行程,是日记的写法,不是诗的写法。

“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之解释,历来聚讼纷纭,或以为是形容苍崖,或以为是夸张想象,从来无人援引过古今地理文献关于当地有虎的记载。

清姚本校、阎奉恩撰康熙重修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邠州志》卷一《地理十七·土产·三水县》:

兽属:虎、豹、狐狸、野豕、黄鼠。^②

清查遵纂辑、沈华订正雍正十年《宜君县志·物产》:

虎、鹿、野鸡。^③

清丁翰修、张柏香等纂嘉庆十二年《中部县志》卷二《物产》:

兽:狐、兔、虎、豹、鹿、狼。^④

兰草《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见闻录》(1991 年):

1962 年夏初。我受命参加一个考察队,赴子午岭考察陕、甘边界。我的主要武器是照相机、手电筒、笔记本和县志。^⑤

大伙一块沿车路梁一直北上。

突然,一只金钱豹,追撵着一群野猪,距离我们不到百米远,山摇地动。一轰而过。大伙都吓呆了,唯有大个子老杨,眼尖手快,立即端起步枪,正准备射击,被王向导一把拦住说:“别开枪!别开枪!你险些闯下大祸。一猪二熊三老虎。咱们没有带猎狗,万不可随便开枪,不然,它会回头扑人的。”

大家受了一场虚惊,谁也没心思再高谈阔论了。^⑥

徐伊丽《秦直道档案:大秦直道》之《刘家店还在沿用的秦直道》(2014 年):

去刘家店林场可以从旬邑县城出发,沿 211 国道到藻池,向北上 306 省道,经马栏到刘家店林场。^⑦

(2003 年) 我第一次到刘家店林场是冬天,当时赶到此处时已经接近傍晚了,而且积雪很深,给考察带来一定的难度。一个队友始终如一地跑在最前面,距我们约 1 里路。另一队友有些着急,一边呼喊,一边朝前冲。由于体力不支,这场雪又下得突然,让人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在这深山里我也不敢贸然行动,只得和司机坐在车里等他们。

^①《李白〈峨眉山月歌〉释证》:“李白诗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经平羌江至嘉州见上弦月,当在初七、初八日,夜宿之时。复据李白诗言‘夜发清溪向三峡’,拂晓前从清溪驿出发,可知是前日即当在初八、初九日拂晓前从嘉州出发,日行一百五十里,当日到清溪驿宿,次日即当在初九、初十日拂晓前从清溪驿出发。”(《北京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第 83—84 页。)

^②清姚本校、阎奉恩撰:康熙重修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邠州志》卷一,叶 57b。

^③清查遵纂辑、沈华订正:雍正十年《宜君县志》,叶 54b。

^④清丁翰修:嘉庆十二年《中部县志》卷二,叶 31b。

^⑤兰草:《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见闻录》,《传记文学》1991 年第 6 期,第 107 页。

^⑥兰草:《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见闻录》,《传记文学》1991 年第 6 期,第 109 页。

^⑦徐伊丽:《秦直道档案—大秦直道》,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年,第 103 页。

二十分钟左右，司机指着远处对我说：“前面有一头奶牛。”我好奇地东张西望，由于车里有雾气，我没能看清楚。下得车来，我用望远镜一看，天啊，那不是奶牛，是一只健壮的金钱豹，它在目视着我们，并不时地向前迈上一小步。我将望远镜递给司机，司机看了一眼，收起望远镜，立即开车去追前面的队友。好在有惊无险，车艰难地拐了一个弯朝回走，再次走到我们发现金钱豹的地方时，大家人多，底气也足了，就想下车拍一张照片，可此时夜幕急速降下，已经看不到200米外远了，金钱豹早已没了踪影。^①

大家感觉没有尽兴，路遇一位老农，便上前搭讪，老农说：“秦直道？我知道，这条路长得很，淳化县是起点，一直向北走，好像要走到内蒙古的一个什么地方。你们是干嘛的？”我说：“拍电视的。”老农紧张地说：“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你们这电视就别拍了。”我问：“为什么？”老农说：“这条路早就没人走了，听老人们说，这条路危险得很，路上有很多古村庄，有进去的人，没出来的人，沿途到处是陷阱和暗器，那都是古人打仗时候埋下的。还有些地方路难走得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迷了路走不出来，饿都要把你饿死的。你就是不进古村庄，一路上也会碰到野兽，野猪和豹子最多。好在这冬天蛇都冬眠了，否则蛇也不少。听说多年前有两个外地来考察子午岭秦直道的，就是叫豹子吃了，有个山里的猎人看到的时候，只剩下一堆骨头，旁边是几件血衣服和一个

照相机。他看了看旁边留下的蹄印，是金钱豹的。从那以后，考察的人就少了。我爷爷说，秦直道这条路不吉祥，从古到今都是一条死人的路。真的，人走在那路上就容易死。”

老人说得我们毛骨悚然的，我们确实捏了一把汗，因为我们刚刚是看到了金钱豹的，相信老农说的话是真的。^②

2014年《旬邑县志》第五编《环境保护》第二节《自然保护区建设》：

石门山自然保护区面积34667公顷，绿化覆盖率72.1%。保护区有金钱豹、林麝、白鹳、黑鹳、金雕六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③

《咸阳年鉴（2010）》《自然保护区 石门山自然保护区》：

位于旬邑县城东南部，距县城21公里，保护区面积3万多公顷。区内有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体系，天然次生林、原始森林及人工林构成良好的植被条件。生活有国家一、二类及省级一、二类保护动物金钱豹、土豹、穿山甲等30余种。^④

案：第一，三水、宜君、坊州（治所中部县，清鄜州中部县，今黄陵县）、鄜州相互毗连，同属于午岭地区，野生动物种类基本上是一样的。

第二，清康熙重修明万历《邠州志·土产·三水》、雍正《宜君县志·物产》、嘉庆《中部县志·物产》均记载当地有虎，确证了杜甫《北征》诗“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的真实性。1962年秦直道考察先行者兰草在旬邑北富县车路梁秦直道遇

^①徐伊丽：《秦直道档案——大秦直道》，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105—106页。

^②徐伊丽：《秦直道档案——大秦直道》，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105—106页。

^③旬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旬邑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193页。

^④咸阳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咸阳年鉴（2010）》，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见金钱豹，2003年秦直道考察者徐伊丽在旬邑北甘肃正宁县刘家店林场秦直道遇见金钱豹，今《旬邑县志》、《咸阳年鉴》记载旬邑石门山自然保护区有金钱豹、土豹，亦足资参证。

换言之，三水、宜君、坊州子午岭地区，自唐至清嘉庆时有虎；今天仍然有金钱豹、土豹。历来关于“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是形容苍崖、或夸张想象的聚讼纷纭，似可息讼止诤矣。

杜甫如何能从虎口脱险？

“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杜甫与虎对峙可知。杜甫安然无恙，此不言而喻。然则杜甫如何从虎口脱险？杜甫没有述及。根据杜诗及相关文献，推测如下，或可资参考。

1. 杜甫曾经学剑，终身长剑防身

《宋本杜工部集》卷九《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

《宋本杜工部集》卷十《蕃剑》：“致此自僻远，又非珠玉装。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

《宋本杜工部集》卷十四《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四：“壮年学书剑。”

《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

《宋本杜工部集》卷十六《夜》：“独坐亲雄剑？”

《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七《人日两篇》之二：“佩剑冲星聊暂拔。”

2. 杜甫漂泊西南经常与虎近，杖剑防虎

《宋本杜工部集》卷五《发阆中》：“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

《宋本杜工部集》卷六《客居》：“峡开四千里，水合数百源。人虎相半居，相伤终两存。”

《宋本杜工部集》卷六《课伐木并序》序：“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擗突。夔人屋壁，列树白葛，镘为墙，实以竹，示式遏。为与虎近，混沌乎无良。”诗：“虎穴连里闻，提防旧风俗。”

《宋本杜工部集》卷六《又上后园山脚》：“忧来杖匣剑，更上林北岡。”

《宋本杜工部集》卷七《夜归》：“夜来（半）归来冲虎过，山黑家中已眠卧。”

《宋本杜工部集》卷十四《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

《宋本杜工部集》卷十四《示獠奴阿段》：“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郡人入夜争餘沥，竖子寻源独不闻。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

《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五《秋》：“不寐防巴虎。”

《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五《复愁十二首》：“人烟生处僻，虎迹过新蹄。”

《宋本杜工部集》卷十六《东屯月夜》：“泥留虎斗迹，月挂客愁村。”

《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七《太歲日》：“愁寂鶯行断，參差虎穴邻。”

宋刻本《李太白集》卷二十六《上安州李长史书》：“乃杖剑去国，辞亲远游。……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

3. 领送杜甫之马夫持有刀枪防虎

《大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驾部郎中》条：“凡三十里一驿，……每驿皆置驿长一人，……凡马三名给丁一人。”

《大唐六典》卷五《兵部尚书》：“天下诸军有健儿。”

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天宝年间长行坊马子是由健儿充任的。”^①

《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元苏天爵《国朝文类(元文类)》卷四十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总序·急递铺》：“卒腰革带，带悬铃、手枪，挟被襖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火炬焉。道狭，车马者、负荷者闻铃则遥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

《永乐大典》卷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五《六幕·铺》录元《(皇朝)经世大典·国朝诸司职掌·急递铺》：“铺兵每名合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②

《元史》卷一百《兵志四·站赤·急递铺兵》：“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

4. 小结

案：第一，杜甫曾经学剑，终身长剑防身。杜甫漂泊西南经常与虎相近，杖剑防虎，甚至“夜半归来冲虎过”，其夔州仆夫阿段亦“常穿虎豹群”，虽然是在至德二载北征遇虎一事之后，但是足资参考。

第二，唐代馆驿隶属于兵部，驿长驿丁均为军事体制人员，长行坊马子(马夫)往往由健儿(士兵)充任，馆驿马夫亦可能由士兵充任；元代急递铺铺兵每人腰铃攀一副，持缨枪一把，以防虎狼，当承袭自前代；而唐代三水县石门关子午

岭山区有虎，石门关驿马夫亦有可能是由士兵充任，或虽非士兵，亦娴熟刀枪，领送行路必持有刀枪，应能对付猛虎。否则驿道停矣。

第三，因此可以推知，当杜甫北征于三水秦直道路遇猛虎时，杜甫与马夫剑枪齐举，与虎对峙，锋刃逼退猛虎，因此杜甫与马夫以及乘马始能安然无恙。或者一举杀伤此虎，亦未可知。李白杖剑去国，洞庭之上，与虎对峙，锋刃逼退猛虎，可以参证。是耶非耶，仅供参考。

至德二载，杜甫三次经历生死关头。四月，杜甫自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逃出，穿越叛军战线，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凤翔行在，是本年第一次出生入死。如杜甫《喜达行在所》云：“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五月，以左拾遗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付三司推问，欲杀杜甫，是本年第二次出生入死。如杜甫《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云：“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云：“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闰八月，北征秦直道上，“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是本年第三次出生入死。至德二载杜甫此三次出生入死，哪一次对杜甫危害最大？千百年上下，读杜诗者，当能知之矣。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

注释

“戴”：顶，把东西加在头上或用头顶着。《孟子·梁惠王上》：“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二《归园田居》之三：“带(一

^①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3页。

^②明解缙等修纂：《永乐大典》，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467页。《经世大典》题目见第6458页。

作戴)月荷锄归。”“石戴古车辙”,写出岩石路面上,顶戴着古时候深深的车辙印。“戴”字拟人,生动传神。

笺证

萧之葆撰修民国二十四年《续纂栒邑县志》卷十《物产·花木》:

花卉树木,恒赖人之培植。邑山僻,花木不及通都之多。所产之花,以牡丹、芍药为冠。秋菊品类颇多。^①

案:由“菊垂今秋花”,和民国《续纂栒邑县志·物产》“秋菊品类颇多”,可见三水从来菊花之盛,包括野生菊花、人工培植的菊花皆盛。

观 2017 年 9 月 2 日富县外宣公众号文章《中国秦直道富县首届露营大会》“秋天的菊花漫山遍野”诸照片,不能不赞叹杜诗“菊垂今秋花”之写实,如在眼前。

三水、宜君、坊州、鄜州相互毗连,同属于子午岭地区,野生植物种类基本上是一样的。

“石戴古车辙”句笺证,已详上文《杜甫行走秦直道之确证:“石戴古车辙”》。

“青云动高兴,”

注释

“青云”:指高空的云,借指高空。《楚辞·远游》:“涉青云以泛滥兮,忽临睨夫旧乡。”晋傅玄

《历九秋篇》诗:“齐讴楚舞纷纷,歌声上激青云。”

笺证

清丁翰修、张柏香等纂嘉庆十二年《中部县志》卷一《山川》:

子午岭县西北一百八十里,南北绵亘千余里,隔界延、庆二府,自咸阳通九原,云中直道。秦蒙恬堑山堙谷,即此岭也。

王开《“秦直道”新探》(1986 年):

(秦直道)位于山脊、贯通南北,连接陕北黄土高原、长“千八百里”(汉里)。^②

秦直道能沿子午岭山脊连续而行……出现了一条千余里长的“沿脊线”路一直道。^③

史念海、吴宏岐《略论秦直道》(1997 年):

1980 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编制的百万分之一 O.N.C(Operationnal Navigation Chart)片上,显示出子午岭山脊上确有古道路存在。^④

子午岭主脊上的秦直道,宽度在 5 米左右,二三辆大车可并行其间从定边到十二连城的直道北段,地势较为平坦,路面宽度则在 22 米左右,更非一般道路所可及。^⑤

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第一章《考古发掘、调查简报、论文·旬邑县秦直道调查钻探简报》(2014 年):

秦直道在旬邑县境内大致为南北走向,基本

^① 萧之葆撰修:民国二十四年《续纂栒邑县志》,《旬邑文库·旧志稽注卷下》,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 年,第 308 页。

^② 清丁翰修:嘉庆十二年《中部县志》卷一,叶 16b。

^③ 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古代交通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733 页。原载《陕西交通史志通讯》1986 年第 5 期,又载《西北史地》1987 年第 2 期,增订稿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 年第 1 期,又载孙闻博编《秦直道研究论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年。

^④ 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古代交通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746 页。

^⑤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秦文化论丛》,第 5 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4 页。

^⑥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秦文化论丛》,第 5 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6 页。

沿山梁分布。……山势起伏较大，视野开阔。^①

案：秦直道大多数路段行走于子午岭山脊亦即山巅，视野开阔，如在青天，嘉庆《中部县志》称之为“云中直道”；直道宽阔平坦，甚至一马平川，行人随意走；故曰“青云动高兴”。

相反，山中驮道多行走于溪谷沿岸，视野逼仄，悬崖峭壁，遮天蔽日，甚至只见一线天，狭窄陡峭，崎岖曲折，行人“跋涉崖谷滑”，不可同日而语矣。

石门关 - 马栏秦直道多行走于子午岭山脊线，已详上文。

“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

注释

“幽事”：幽景，僻静、幽雅之景物。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杜甫《秦州杂诗》之九：“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叠多幽事，喧呼阅使星。”杜甫《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琐细”：细小。唐任华《杂言寄李白》：“我闻当今有李白，《大鹏赋》、《鸿猷文》，嗤长卿，笑子云，班、张所作琐细不入耳。”“琐”，细碎、细小。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观其断，岩岩如琐石。”

“罗”：1.陈列、罗列。《楚辞·招魂》：“轩辌既低，步骑罗些。”汉王逸注：“罗，列也。”杜甫《赠卫八处士》：“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2.分布；分

散。

《史记·五帝本纪》：“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唐司马贞索隐：“罗，广布也。”唐韩愈《南山诗》：“或罗若星离，或蔚若云逗。”

“橡栗”：栎树的果实，又名橡实、橡子、橡果，外表硬壳，棕红色，内仁如花生仁，含有丰富的淀粉。《庄子·盗跖》：“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笺证

萧之葆撰修民国二十四年《续纂栒邑县志》卷十《物产·花木》：

自桃、李、梨、杏外，如萱草、玫瑰、玉簪、海棠、水仙、月季、夜合、鸡冠、凤仙、石榴、木芙蓉等，均楚楚争胜。莲花间亦有之，惟罂粟过多，近在禁种之列，不得与群芳为伍。木则以松、柏为上，余如椿、楸、槐、榆、漆、桐、棠棣、橡、枣、桑、竹、杨、柳，则所在皆有。^②

2014 年《旬邑县志》第五编《环境保护》第五章《生态保护》第二节《自然保护区建设》：

石门山自然保护区面积 34667 公顷，绿化覆盖率 72.1%。保护区有金钱豹、林麝、白鹤、黑鹤、金雕六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另有鸳鸯等 17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包括杜松、水曲柳等珍贵树种在内的高等植物 72 科 668 种，另有猪苓、党参、黄芪等药用植物。^③

清查遴纂辑、沈华订正雍正十年《宜君县志·物产》：

①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年，第 90 页。

②萧之葆撰修：民国二十四年《续纂栒邑县志》，《旬邑文库·旧志稽注卷下》，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 年，第 308 页。

③旬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旬邑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年，第 193 页。

榛子、核桃。^①

案：由“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民国《续纂栒邑县志·物产》“桃、李、梨、杏”、“棠棣、橡、枣、桑”，“所在皆有”，雍正《宜君县志·物产》“榛子、核桃”，可见三水、宜君从来果木之盛，包括野生山果、人工培植的果木皆盛。

观 2017 年 9 月 2 日富县外宣公众号文章《中国秦直道富县首届露营大会》“不要问我这红红的是什么东东，我只会告诉你它可以吃”系列照片，2017 年 10 月 23 日延安融媒体中心公众号文章《秦直道上秋风起，秋色今年又等你》“这别致的小景儿”系列照片，不能不赞叹杜诗“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之写实，如在眼前。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注云：“大约菊垂以下，皆邠土风物，此属佳景。”引周甸注：“途中所历，有可伤者，有可畏者，有可喜者，有可痛者。”又引申涵光曰：“丹砂数句，混然元化。”诸家注皆有见地，但此段诗歌之意义，似犹可引申说明。

“菊垂今秋花”十句，在上下文所写呻吟流血的人间世中，突然写出一片“可喜”之“佳景”，真是韵致，是大家气象。虽然人间世在呻吟流血，大自然却仍然在开花结果，灿烂的山花，丹红、漆黑的山果，在雨露滋润下，纷纷开花结果。这些细小而顽强的生命，深深地感动了诗人，鼓舞了诗人，复苏了他悲怆的心灵，滋长了他精神的活力。自然的生机，人心的生机，乃融为一体。这就是诗人

在那多难的时代氛围里产生由衷喜悦的深刻原因。

诗人渴望祖国新生的意愿，因此更加顽强有力。诗末再三致意说，“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周汉获再兴”，“于今国犹活”，“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在诗人全幅心灵和诗境里，从大自然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成了投入现实人间的精神力量。

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以复苏忧伤心灵，是杜诗独创的体验和意境。此种体验和意境，始见于《北征》，以后陆续呈现在一系列杜诗中，例如：《江亭》、《后游》、《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续得观书》、《云》、《月三首》、《月》、《江汉》。

从大自然汲取生机意境中的自然意象美，是对盛唐诗自然意象传统的突破与发展。在盛唐诗，自然意象美意味着人开朗的心情，它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常状态的融洽，人在这时从自然的所得，好比是锦上添花。在杜诗中，自然意象美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人在这时从自然的所得，好比是雪中送炭，它意味着人对悲剧命运的克服，人比悲剧命运更强，更高。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

注释

“缅思”：遥想。杜甫《画鹘行》：“缅思云沙际，自有烟雾质。”“缅思桃源”，字面是指陶渊明《桃花源记》之桃源，其实即是指眼前“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之子午岭山中。桃源何在？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也。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言面对此“青

^①清查遵纂辑、沈华订正：雍正十年《宜君县志》，叶 54b。

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之世外桃源，更加感慨自己身陷战乱时代与黑暗政治之中。

事实上，子午岭秦直道一带山中，还真是世外桃源。

笺证

兰草《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见闻录》(1991年)：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然灾害时期，逃荒难民来到这里，发现又宽又平的路，正好种地。谁知，路基地质硬，种上庄稼不肯长，以后再也没有人种了。^①107

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第四章《孤村夜语—考古日志选·黑户》：

女主人毫不掩饰地说自己家为黑户，即无户口、无身份证，政府各部门(农业、林业、公安、民政、人口、计划生育等等)均未在册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13亿余人口以外的人家。女主人还说在这山里，黑户一满都有。交谈得知，女子志丹人，其掌柜靖边人，两人青春时不满父母包办婚姻，私奔至此绝境安身，借放羊种地为生，已十八年矣。今育有二男一女。^②

杜甫对此世外桃源之言，不经意间，竟成为预言。

“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

注释

“坡陀”：山势起伏不平貌。汉司马相如《子虚赋》：“罢池陂陀，下属江河。”

“鄜畤”：秦文公在鄜地建立祭祀天地五帝的祭坛，称鄜畤。畤，古时帝王祭祀天地五帝的祭坛。《史记·秦本纪》：“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刘宋裴骃《集解》：“李奇曰：鄜音孚。山阪曰衍。”鄜畤，此代指鄜州。

笺证

2014年《旬邑县志》第二编《自然地理》第一章《地貌》：

旬邑县地处黄土高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山塬各半，落差明显。平均海拔1358米。石门山峰最高海拔1885.5米，是全县最高点；三水河出境处是全县最低处，海拔850米。东北部的马栏、石门山地是子午岭伸向西南的余脉，海拔1300—1855米。^③

1992年《宜君县志》第二编《自然地理志》：

宜君地属子午岭桥山山系，……境内群山毓秀，林丰草茂。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仅东与东北部分为破碎黄土高原。海拔最低622米，最高1734米多，相对高差1112.9米。^④

1995年《黄陵县志·概述》：

黄陵县位于陕西省中部，延安地区南端。北与富县接壤，南与宜君毗邻，东临洛川县，西靠甘肃省正宁县。……境内地形复杂，山、川、原、坡、沟并存，西北高而东南低。最高海拔1762.2米，

^①兰草：《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见闻录》，《传记文学》1991年第6期，第107页。

^②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286页。

^③旬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旬邑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④宜君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君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59页。

最低海拔 740 米，最大高差 1022.2 米。^①

1994 年《富县志·概述》：

境内最高海拔 1687 米，最低 846.6 米，一般海拔在 1000 到 1200 米之间。县境东有洛河，西部有葫芦河，……两川之间是……高原沟壑区。……高原沟壑的北部和西部为丘陵沟壑区。……土石低山，主要分布在县境西部与甘肃省交界的子午岭地区……林草覆盖率高达 90% 以上，属天然次生林保护区，被称为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②

案：自三水朝东北至宜君、黄陵、鄜州一带之地貌形态，均为子午岭山脉和黄土高原交错。其地势高低，三水平均海拔 1358 米，最高海拔 1885.5 米；宜君海拔最低 622 米，最高 1734 米多，地势稍低于三水；黄陵最高海拔 1762.2 米，最低海拔 740 米，约与宜君相等；鄜州最高海拔 1687 米，最低海拔 846.6 米，一般海拔在 1000 到 1200 米之间，地势又稍低于宜君、黄陵。因此，当杜甫行走在三水石门关—宜君马栏的子午岭山脊秦直道上，“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乃是约略以俯瞰姿态，遥望鄜州方向黄土原梁与群山万壑，此起彼伏，交错出没——那是家的所在。

“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

注释

“水滨”：指马栏河南岸。

“我仆”：此当指步行领送杜甫自石门关至马栏的石门关驿马夫。已详上文《杜甫自邠州至宜

君随行之仆夫，系沿途各州县及中间站馆驿所派出之驿丁或马夫，接力担任步行领送任务》。

“木末”：树梢。《楚辞·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南朝梁刘孝标注《东阳金华山栖志》：“夫鸟居山上，层巢木末。”

“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诗言我走下坡路已到河边，我仆夫还走在后面高处路上，树梢之畔。杜甫《山馆》：“路危行木杪，身远宿云端。”可以参读。

黄庭坚《次韵伯氏长芦寺下》：“携手霜木末，朱栏见潮生。”“携手霜木末”，极言立处之高，是从杜甫《北征》“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句化出。

笺证

王开《“秦直道”新探》（1986 年）：

由石门关西侧沿子午岭主脉北行，经碾子院、前陡坡、卧牛石、老爷庙、大店至马栏河，这一段山岭统称“凤子梁”（又名枫树梁），下风子梁过马栏河（又称三水河），即上杨家胡同梁。这座山梁很高，现为旬邑县杨家店林场所在地。^③

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第一章《考古发掘、调查简报、论文·旬邑县秦直道调查钻探简报》（2014 年）：

一、旬邑县秦直道概况

在旬邑县境内，秦直道南于前蝎子掌接淳化县秦直道，向北，下盘头坡，越七里川，经大草沟、庙沟、石门关、碾子院东、前陡坡，越马栏河谷，至两女寨。^④

^①黄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黄陵县志》，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 年，第 1 页。

^②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富县志·概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 页。

^③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古代交通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736 页。

^④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年，第 90—91 页。

二、旬邑县秦直道的基本走向

(一)前蝎子掌至石门关

该段秦直道长约 11 公里。大部分路段沿山脊线延伸,道路普遍比较平直,在七里川过河一次。秦直道旬邑段的最南端,始于淳化、旬邑两县交界的前蝎子掌。^①

(二)石门关至旬邑、耀州交界处

该段秦直道长约 17 公里。

石门关向北……到达上瓦房川……到达卧牛石。……^②

(三)旬邑、耀州交界处至马栏

该段秦直道长约 16 公里。

……经过上庄子,再延伸约 1.2 公里到达大店,大店标高为 1528 米。大店向北约 1 公里到达风子梁。该段的子午岭支脉山梁通称为风子梁。从风子梁开始,秦直道向正北方向延伸。向北约 300 米过标高点 1602 米,再向北约 2 公里到达马栏河谷地的马栏。^③

(四)马栏至刘家店

该段秦直道长约 14 公里。

其间过马栏河上山一段非常曲折,此后较为平直。大体向西北方向延伸,在标高点 1631 米处

进入甘肃省正宁县境内。秦直道过马栏河后,从马栏革命旧址窑洞处上坡。^④

案:第一,根据王开《“秦直道”新探》、张在明等《旬邑县秦直道调查钻探简报》,可知秦直道自石门关向北经碾子院东、上瓦房川、前陡坡、卧牛石、老爷庙、上庄子、大店、风子梁,到达马栏河,过马栏河到达今马栏革命旧址;复按 1955 年美国陆军制图局二十五万分之一中国图 NI49-1《PIN-HSIEN 邻县》地图^⑤,2014 年地之图官网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咸阳市 - 旬邑县地图》^⑥,并参照 2020 年百度地图旬邑县^⑦,秦直道自石门关向北经碾子院东、上瓦房川、前陡坡、卧牛石、老爷庙、上庄子、大店、风子梁至马栏之间,除今马栏革命旧址南的马栏河外,别无东西流向河流,可知杜甫《北征》“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是写自石门关北行抵达马栏河南岸,即将过马栏河,到达马栏驿。

第二,张在明等《旬邑县秦直道调查钻探简报》历述旬邑县秦直道由南而北全程越过河流两次,一是在石门关南过七里川河,二是在今马栏革命旧址南过马栏河,其中石门关至旬邑、耀州交界处,旬邑、耀州交界处至马栏河以南,并无过

^①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年,第 92 页。

^②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年,第 92-93 页。

^③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年,第 93 页。

^④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年,第 94 页。

^⑤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图书馆 (<https://www.utexas.edu/>): <http://legacy.lib.utexas.edu/maps/ams/china/ttx-oclc-10552568-ni49-1.jpg>。

^⑥地之图:<http://map.ps123.net/china/2352.html>。

^⑦旬邑县 - 百度地图 :https://map.baidu.com/search/?E6%97%AC% E9%82%91% E5%8E%BF/@12091142.953830076,4171714.9960288852,12.76z?querytype=s&wd=% E6%97%AC% E9%82%91&c=131&pn=0&device_ratio=1&da_src=shareurl。

河，亦可以作为有力旁证。

2014年《旬邑县志》第二编《自然地理》第四章《水文》第一节《水系·主要河流·三水河》：

亦称汎河。上游河段称马栏河，发源于马栏山区北部杨家洞西北部与黄陵县分界（分水岭）的西南侧。从源头向东南流到杨家洞后，转为北南向，从关门子又转为东北—西南向，经转角、马栏、县城于丈八寺镇蔡家河滩出境流入彬县。全长128.1千米，旬邑境内长113.5千米，为境内最长的一条河流。^①

三水河上段穿流马栏山区，河宽一般在10—20米之间。河床比降大，约10%—15%，水流较急，河床切入基岩80—100米；转角以下即中段，河道比降明显减小，只有5%；县城以下的河道处在黄土高原区，河流下切强烈，两岸陡峭，河道较为开阔，宽50—100米，河床比降微有增加，为5.9%。^②

2014年《旬邑县志》第二编《自然地理》第四章《水文》第二节《水文状况》：

河川径流时间分布三水河的汛期为7—10月，径流总量4940万立方米，占年径流量的53.8%。

洪水与枯水以三水河为例，洪水主要由暴雨造成，多在6—9月出现，以7、8两个月最多。^③

案：第一，由马栏河河床比降较大，河床切入基岩较深，可知子午岭上秦直道在过马栏河时，会有较大的下坡；而在下坡路上，马行走势自然较快，因此形成“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诗人

骑马已经快步走到前方下坡路尽头的马栏河南岸，马夫犹在后面高坡路上。

在秦直道大多数平坦路上，杜甫乘马是与步行领送的马夫一起行路，形影不离。

第二，至德二载闰八月，马栏河正值汛期，水势很大，秦直道过马栏河当有河桥，可以安稳过河。

《北征》自“猛虎立我前”起，至“我仆犹木末”止一段诗，是叙述自石门关至马栏一段行程，可以称之为《北征》秦直道段。

《北征》完整地记叙了邠州—马栏的两次过河：“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是记叙越过泾水北上；“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是记叙抵达马栏河南岸。

石门关至马栏72里（33公里；57清里），是一日较大行程，唐代马栏当有馆驿，隶属于宜君县。杜甫与马夫到达马栏后，当止宿于马栏驿，次日凌晨，杜甫自马栏启程至宜君县，当由宜君县马栏驿人员步行领送。

根据上文所考，杜甫北征止宿马栏驿，时间当在至德二载闰八月八日左右。

石门关驿马夫已完成领送任务，或将等待杜甫所乘借之马，由鄜州、坊州、宜君馆驿接力乘回马栏，再乘回石门关，然后经石门关、三水馆驿接力，最终归还到邠州。

“鹍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

笺证

上二句“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写抵达

^①旬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旬邑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

^②旬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旬邑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

^③旬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旬邑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

马栏河，略去到宿马栏，接着此二句“鶡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应是写次日自马栏至宜君县、玉华宫驿道上所见景象。自马栏至宜君县，系驿道。

徐伊丽《秦直道档案：大秦直道》之《刘家店还在沿用的秦直道》述甘肃旬邑北甘肃正宁县刘家店老农说：

这条路危险得很，路上有很多古村庄，有进去的人，没出来的人，沿途到处是陷阱和暗器，那都是古人打仗时候埋下的。^①

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第四章《孤村夜语—考古日志选·大麦秸沟梁探直道》：

2007年4月28日 星期六 晴

占民、小史继续发掘探沟4、5。老张、小王、小阎步行调查、GPS测量（富县）大麦秸沟梁直道。

该段直道长约20公里，因为远离村落，一路无人烟，加之绝大部分路面被梢林覆没，过去从未调查过。

大麦秸沟梁直道注：大麦秸村、椿树庄、白水崾岘，均为秦直道上曾经的居民点，今多已被废弃，无人居住。

案：“鶡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当为叙述自马栏至玉华宫驿道子午岭山中之荒无人烟。由徐伊丽《秦直道档案：大秦直道》所述旬邑北甘肃正宁县刘家店老农说“这条路危险得很，路上有很多古村庄，有进去的人，没出来的人”，张在明等

《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所述富县“大麦秸村、椿树庄、白水崾岘，均为秦直道上曾经的居民点，今多已被废弃，无人居住”，可见今日子午岭山中很多地方之荒无人烟，今犹如此，何况千年之前之唐代耶。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笺证

此下六句，续写自马栏至宜君县、玉华宫驿道上所见所感。《北征》并未写到到达宜君县、玉华宫，杜甫另有《玉华宫》诗标明到达玉华宫。在实际行程中，马栏—宜君县80里，宜君县至玉华宫仅4里，杜甫当是止宿宜君县。翌晨启程，经行玉华宫，前往坊州。

马栏—宜君距离为80里，岂中途并未止宿，故行路至于夜深耶？然则已接近宜君县治矣。

拙作《〈诸将〉第一首笺证一则》：

关于安史叛军入关后关中战区态势。

安史叛军攻破潼关，在玄宗天宝十五载即肃宗至德元载（756）六月九日，十日后入长安。唐军收复长安，在至德二载（757）九月二十八日，月内收复潼关。安史叛军占据关中东起潼关西至长安一带地区，计一年又三个月。

至（至德元载）八月，据《旧唐书·崔光远传》及《通鉴》，唐朝军营（“光远营”）已驻扎渭北，并在渭北之泾阳（今陕西泾阳）歼灭“剽掠”至此之安史叛军二千余人，使安史叛军畏其“勇劲，常避其锋”。这表明，唐军已控制长安以北泾阳一线。渭水，位于长安北50里。泾阳，位于长安北（微

^①徐伊丽：《秦直道档案——大秦直道》，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106页。

^②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288页。

偏西北)70里。

由上所考可知,至德元载六、七、八月,安史叛军兵力所及范围,在长安西140里(武功)至长安北70里(泾阳)一线之内。

至德元载八月以后,关中唐军与安史叛军作战,虽双方互有胜负,但总体形势是推向长安近郊以至长安以东,直至收复长安以至潼关。^①

案:从至德元载六月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到至德二载(757)九月二十八日唐军收复长安期间,安史叛军从未到达泾阳一线以北,更不用说远在泾阳一线以北的三水、宜君。由此可知,“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虽未写出“古”字,但实际是指古战场,与安史之乱战争无关。

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第一章《考古发掘、调查简报、论文·富县车路梁秦直道发掘简报》(2014年):

2006年11月30日—12月7日、2007年4月9日—5月6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院)秦直道考古队,先后对陕西富县车路梁段的秦直道进行了考古发掘,还对富县马莲沟梁、桦沟梁、大麦桔沟梁的秦直道进行了考古调查。^②

六、探沟5

(五)结语

3. 探沟5出土的铜镞与秦陵兵马俑一号坑所出者完全相同,殊为珍贵,不失为本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收获。同时说明,在秦汉时期,富县的车路梁一带,曾经是一个兵家必争的古战场。^③

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第四章《孤村夜语—考古日志选·出土铜镞》:

2009年5月9日 星期六 多云转雨

上午发掘。下部探方车辙辙梁上出土无铤铜镞1件,与前年车路梁所出铜镞迥异,甚喜。查看铜镞方向,系自下而上,略为自东向西,可判断为匈奴一方使用的武器。算一下,两次铜镞出土地点相距(直线距离)仅两三公里。

看来,(富县)桦沟口这个秦直道上的关卡,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南北战争。^④

案:由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所述,在富县车路梁段秦直道、富县桦沟口段秦直道,均有出土铜镞,与秦陵兵马俑一号坑所出者完全相同,表明“在秦汉时期,富县的车路梁一带,曾经是一个兵家必争的古战场”,“桦沟口这个秦直道上的关卡,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南北战争”,可见秦直道地区自秦以来经历战争甚多,杜甫北征自马栏至玉华宫驿道上所见古战场,是秦直道附近古战场遗迹之一。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描写古战场苍凉惨淡画面,“深”、“寒”、“照”、“白”四字,传神写照。

“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笺证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唐肃宗至德元年五月:

^①邓小军:《〈诸将〉第一首笺证一则》,《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1期,第36—38页。

^②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3页。

^③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32页。

^④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306页。

上遣使趣哥舒翰进兵复陕、洛。翰奏曰：“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郭子仪、李光弼亦上言：“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惟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国忠疑翰谋已，言于上……上以为然，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丙戌，引兵出关。

己丑，遇崔乾祐之军于灵宝西原。乾祐据险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军与乾祐会战。乾祐伏兵于险，翰与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观军势，见乾祐兵少，趣诸军使进。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以兵三万登河北阜望之，鸣鼓以助其势。……须臾，伏兵发，贼乘高下木石，击杀士卒甚众。道隘，士卒如束，枪槊不得用……乾祐遣同罗精骑自南山过，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后军见前军败，皆自溃，河北军望之亦溃，瞬息间，两岸皆空。……士卒得入关者才八千余人。辛卯，乾祐进攻潼关，克之。

案：杜甫北征经过古战场，触景生情，身当唐朝国土沦陷，人民遭受残害，内忧外患交迫之际，抚今追昔，固不能不痛心于当年潼关会战之惨败，致使半数秦民，为之惨烈牺牲。

七、结语

第一，杜甫《北征》诗有三道确实证据，共同确证杜甫北征经行秦直道三水石门关—宜君马栏段。

1.《北征》“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确证杜甫北征自邠州越过泾水北上经行三水县地域。因为自邠州北上驿道曲折仅20里即进入三水县

境；而且，杜甫此行经过玉华宫，作有《玉华宫》诗标明之，而自邠州至玉华宫，三水县地域是必经之地。

2.《北征》三水县部分“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确证杜甫行走秦直道三水县石门关—宜君县马栏段。因为除了不经县城的秦直道外，三水县“自古不通车路”，只有驿道，不能通车；秦直道重要功能是并排通行多辆辎重车辆，而秦直道石门关—马栏段多沿子午岭山脊线延伸，秦直道子午岭山脊路面多系松软的砂岩、风化石，辎重车辆能留下车辙沟痕迹。

3.《北征》“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确证杜甫自石门关北上行走秦直道抵达马栏河南岸，即将过马栏河，抵达马栏。因为秦直道自石门关北至马栏之间，除马栏南的马栏河外，别无东西流向河流。

第二，杜甫《北征》诗细致叙述亲身经行秦直道石门关—马栏段，包含关于唐代秦直道自然、人文之情况的大量信息，为诗史增加了深厚的历史地理内容，是自汉司马迁《史记》以后关于秦直道的稀有的、最直观的、路段信息最翔实的珍贵文献。

在汉司马迁《史记》之后，今日所见最早记述秦直道的历史文献，只有唐代两种文献，《史记·匈奴列传》唐张守节《正义》所引唐代魏王李泰《括地志》，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宁州·襄乐县》，各一两句话而已。至清康熙《鄜州志》、嘉庆《中部县志》等地方志中有关秦直道的记载，亦仅寥寥数语。唐杜甫《北征》关于亲身经行秦直道的翔实叙述，因此弥足珍贵。

八、余论

杜甫是否知道自己行经秦直道？

杜甫《北征》没有直接表明知道自己行经秦直道。

但是,杜甫熟习《史记》^①,《北征》“石戴古车辙”,明白表示自己行走在通辐重车的岩石路面路段的古代重要大道上,因此,杜甫可能知道或意识到自己行经的是秦直道。

为什么《北征》没有直接表明知道自己行走

秦直道?当是因为杜甫此时全部忧患意识是在当前安史之乱和肃宗政治黑暗,心思无暇专门发此思古之幽情,从写作技术来说,不必有此枝蔓亦好。

(邓小军: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原载于《中国诗学研究》第18辑,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内容据作者同意进行了修订。)

附记

1. 修订3处

(1)第一处

《北征》包含杜甫经行三水县地域、行走秦直道、乘马、借马、随从马夫等历史地理及历史制度问题,从来无人涉及。

修訂为:

《北征》包含杜甫经行三水县地域、行走秦直道等历史地理问题,及乘马、借马、随从马夫等背后的历史制度问题,从来无人涉及。

(2)第二处

过马栏河到达马栏 修訂为:过马栏河到达今马栏革命旧址

除马栏南的马栏河外 修訂为:除今马栏革命旧址南的马栏河外

即将过马栏河,到达马栏 修訂为:将过马栏河,到达马栏驿

(3)第三处

二是在马栏南过马栏河 修訂为:二是在今马栏革命旧址南过马栏河

2. 关于唐马栏驿位置

光緒《大清會典圖》卷二百八《輿地·陝西省四·鄜州圖》,标馬栏鎮位于馬栏川北岸;

图說:馬栏水出宜君縣石底子諸谷,西南流經馬栏鎮,入邠州三水縣鎮。

可见唐馬栏驿当位于馬栏河北岸(今馬栏村位于馬栏河南岸即东南岸)。

本文凡述及唐代馬栏,均指唐馬栏驿。

^①苏轼《东坡志林》卷十一:“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囊言会也。”杨奔奔《杜诗引〈史记〉》考论:“杜诗约征引《史记》八十七篇,对于本纪、世家、列传、书、表都有涉及,征引总数五百四十九,列传征引次数最多。可以发现,《史记》在杜诗中被广泛引用,杜诗对于《史记》的征引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41页。)

摩石有成

——从李浩《摩石录》谈跨域石刻证史的新视野与新潮流

宋德熹

李浩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应邀来台湾逢甲及兴大客座。以文学博士之姿,夙以 1996 年《唐代园林别业考论》卓然成家,1999 年《唐代关中土族与文学》、2002 年《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土族研究》转向地域家族文学新关怀,出入文史之间,显见作者文史合流、跨域互证的学术风格其来有自,既赓续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岑仲勉《金石论丛》、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周勋初《唐语林校证》等前辈学者文史互证的风范,也受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兼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①、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等的熏染。

李浩虽谦称“辁材末学”不擅金石学,但 1999 年曾发表《范碑所述李白世系的谱牒学问题》,跨域运用碑志钻研谱牒所涉及家族与社会课题,连同前揭园林别业、关中土族与地域文学的研究路径,皆已水到渠成,显露李浩出入文史的学术特色。本书缘于其老友齐志所收藏关中陕北为主的《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馆藏志》166 方(其中唐代 146 方)。作者藉此机缘和友情摩石有成,先行针对士人知识分子的墓志,以及

少数民族、入华外族的墓志塔铭取样初步探研,撰写九篇自谦“并不是系统全面的专门研究,只不过是学术新信息的阶段性发布和公开”(页 30,其中两文主题人物同为唐初李百药)。诚如本书代前言《究人冥天之际》,李浩归纳石刻研究涉及跨学科交叉包括生命伦理学、遗址景观学、丧葬人类学、图绘现象学及碑刻文献学(页 36—40),跨领域则含摄政治、中西交通、民族关系、佛教与女性信仰、宗教建筑及美术、宗教学、书法史、刻石工艺学、古代乐律学等诸多课题(页 226、296)。当然这些高难度的技艺与视野,可能只是韦伯式的理想型或未来式,本非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所能承担所有的理论与实际。

陈尚君在本书序文曾引述陈寅恪一段常被忽略运用新旧材料方法的诤言,指出“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当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致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②陈寅恪的看法于今仍然深具针砭作用,晚近以来大陆墓志石刻“井喷式”

^①陈尚君不仅编纂《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书,无私供应文史学界新材料,2016 年并剑及履及全面发挥石刻证史之功,出版《贞石诠唐》,藉由新出石刻材料探究新问题,一时蔚为石刻学研究的新潮流。

^②见本书页 14。陈寅恪语原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35 年谱,另参陈尚君:《贞石诠唐·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页 187)。

(页 33)出现,一时石刻学复兴呼声风起云涌,但也带来包袱,墓志研究繁荣的背后存在着歧路亡羊的“碎片化”隐忧。^①关键是不能孤立地只根据一两方墓志即见猎心喜,而忽视新旧材料的互证,并进行墓志的史学分析,非仅止于史料整辑排比而已。^②李浩在本书也语重心长指出,过分炫耀抢救性及善后性的工作,并将破解古人所设机巧视为重大的发现发明,究竟是幸焉,抑或不幸焉?此语牵涉碑刻的作伪与辨伪问题,李浩特举近期网络喧腾一时的唐鸿胪寺丞(从六品上)李训墓志真伪为例(页 41–44),其中“朝臣备”是否想当然耳为日本国朝臣吉备真备?拜读辛德勇《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讲稿之后,对照真品《李训夫人王氏墓志》透露李训卒于长安官舍而非河南圣善寺别院的铁证,故而李训墓志连同墓志书丹的朝臣备皆判为膺品造假,此桩公案也随之沉寂。

但新出土墓志石刻犹如抢滩,历史解释的新发现也一步一步随足迹推进,诚如饶宗颐《法国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拓本图录引言》指出的,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本书页 23《代前言》也引用),譬如陈尚君和高明士先后为文提及墓志发现日本国名的一段趣闻,指出从唐玄宗开元年间井真成墓志到武周末

中宗朝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中先后披露日本国号,历经叶国良笔录古董店杜嗣先墓志拓本,高桥继男、金子修一、韩升等众多学者相继探讨“日本来庭”的系年,终究无法吻合高宗咸亨元年(670)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的定说。此一课题卒有赖 2011 年王连龙《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引用《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并序》拓本图片,透露出祢军卒年的高宗仪凤三年(678),虽然未能一锤定音,仍是今存墓志所见日本国号最接近咸亨元年的依据。^③石刻证史之功,由此可见。

李浩本书在新出石刻证史上的贡献,陈尚君序文和李浩《代前言》已多所指陈,在此拟就陈寅恪所谓新材料研求新问题的说法,表彰本书运用九方墓志(其实延伸引用尚有多方)主题研究后的几点重要成果,如下:其一、探讨唐初乐律学家祖孝孙生卒年、祖氏家学传授与师承毛爽、沈重名家,以及其对隋末唐初乐律学的贡献。文中不厌其烦地针对祖孝孙墓志铭所涉乐律的专门术语和关键词汇进行疏解,展现中文系本行一贯的素养,值得肯定。待斟酌的是,唐初祖孝孙与北齐祖珽兄弟字号为孝字辈,是否即为孝孙同辈?年代落差可再斟酌(页 54)。其二、隋末名将薛世雄之妻冯五娘源出北魏外戚长乐冯氏^④,双方家族

^①陈爽:《中古墓志研究三题》,《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七辑,2017。

^②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4期,2006。所谓“整辑排比,谓之史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浙东学术》。

^③陈尚君:《气贺泽保规〈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出版以来新发表唐代墓志述评》,《贞石诠唐》,页 383–384,另详参高明士:《“日本”国号与“天皇”制的起源——以最近发见的墓志、木简为据》,《台湾师大历史学报》48 期,2012,页 260–268。

^④本书参用张说《故括州刺史赠工部尚书冯公神道碑》和维基百科《中国士族世系图列表》之〈长乐冯氏世系图〉,可再详参窟添庆文,《长乐冯氏に关する诸问题》,《立正史学》111 号,2012,收入氏著《墓志を用いた北魏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7。

累世显贵，以及其诸子薛万彻等唐初军政事迹。至于薛世雄家族是否系出河东薛氏南祖房，拟详下讨论。

其三、本书透过新发现唐初著名文学官僚李百药墓志铭中丧葬地的变化，观察赵郡李氏汉中房迁徙、迁厝的现象，特别揭露李百药墓志铭援引杜预等四位古人未归葬原籍祖茔，反而未循安土重迁的传统，“遗令”迁葬京师长安所居的雍州万年县少陵原，“利于便近”抉择居家(或卒地)而就近选择葬地。李浩重新检讨陈寅恪所谓李德裕家族归葬传说，反证多数山东士族迁葬于两京之说，以及毛汉光藉由中古士族双家型态中央化移居两京的现象，认为转型理论下士族变迁流动，潜转暗换于中唐之前，甚至早于初唐或西魏北周前就已出现，故而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上限”可以往前推。(页 139—142、147—148)此问题意识，拟详下讨论。

其四、李浩藉由《李堪妻宗氏墓志铭》，勾勒宗氏为武后韦后宠臣宰相宗楚客次女，李隆基唐隆政变宗楚客伏诛后家道中衰，从辉煌归于平淡，冷暖自知地呈现家族的兴衰史，大诗人李白续弦宗氏也出自此一家族。本书文中对墓志中的语词概念详加疏解，对宗氏世系有所厘清，并进而探讨李堪妻宗氏、李白妻宗氏^①与隐居庐山的奸相李林甫女李腾空、蔡侍郎女蔡寻真，同赴庐山学道，俨然形成“开元天宝时期一个以女性为主的权贵道教信仰俱乐部”(页 174)。待斟酌的

是，宗氏丈夫李堪开元二十七年的职衔是主爵郎中，亦即司封郎中从五品上^②，墓志又提及宗氏“出适皇族”(页 152)，由于年代不相当且墓志未及爵位，故李浩已辨证李堪非寿王李瑁之子广阳郡王，笔者认为此李堪亦非《通鉴》卷 207 记述张柬之五王政变时入宫倒周的李湛(武周奸臣李义府之子，非皇族)。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司封郎中条有李湛题名，《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司封郎中条则未见李湛，应皆与李堪无关，故而宗氏的丈夫李堪形同历史人事悬案。本书指出李堪职衔为主爵郎中、彭州刺史，前者翻查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后者检索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皆徒劳无功。确如本书所言可补郁贤皓彭州刺史名单的空白，但唐人于官名喜用省称，丞郎为尚书左右丞和六曹侍郎的官称缩略^③，严先生该书所谓的“郎”，只及侍郎，未遑下级的郎中，其实应查《郎官石柱题名考》才是。

其五、榆阳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馆藏新发现唐代刻石名家邵建和墓志，透露出邵氏长期担任中书省镌字官、玉册官，属于内廷御用刻石工匠，同时也是柳公权书法的固定合作伙伴。墓志呈现邵氏家族的系谱，虽刻工的社会地位不高，一般墓志铭只提及墓志与铭文的作者，特别是知名作家或书法家参与撰述，倍觉光彩，刻史工匠鲜少留名，但刻工工艺的技术专业仍有家族化、集团化现象。志文更特别提到同行的八位刻石名家

^①以诗史互证的方式探讨李白与宗夫人的婚姻生活，可参李从军：《李白家室考辨》《李白与宗氏婚配考》，《李白考异录》，山东：齐鲁书社，1986；范震威：《李白的家庭与婚姻》，《李白的身世、婚姻与家庭——兼质疑郭沫若等的李白论》，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②《大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条(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页 39 上栏)指出唐初主爵郎中，武周光宅元年改为司封郎中，中宗神龙元年复名主爵，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又改为司封。

^③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 324。

排行榜,诚如李浩所谓“几可构成一部唐代石刻工简史纲要”,殊为难得,本书也借重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曾毅公《石刻考工录》研究成果,分别逐一表彰这几位技术名家的一生成就。^①

其六、本书最后三篇文章皆集中于四方外族墓志的初步考察。其中唐代吐谷浑慕容氏成月公主墓志指出,公主为吐谷浑国主诺曷钵(慕容钵)与太宗宗室女弘化公主所生,幼年即入长安兴圣寺出家为尼,二十三岁卒于寺内。李浩藉此综合濮仲远、周伟洲共十四方涉及吐谷浑的墓志,加以胪列成表简介,并特别对读弘化公主墓志以解析成月公主的身世与背后的国际关系。[和亲背后所显示唐朝与吐谷浑、吐蕃的国际关系,详参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页 283—287;同氏:《吐谷浑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 230—234;卢勋等著:《隋唐民族史》,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页 112—12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浩藉由成月公主出家兴圣寺为引子,比较兴圣寺主尼法澄塔铭,观察唐代贵族女性崇佛现象,附带谈及兴圣寺的建筑及其变迁,其中法澄卒后葬于马头空的石室,此即刘淑芬详为考证所谓的石室瘗葬。但成月公主入寺为尼究竟是一种坚定的信仰,抑或“要么就是一种处罚”(页 218),惜本书并未提供进一步的解答。李浩也指

出刘淑芬误以为法澄是唐初宰相萧瑀的伍女“法灯”,可能是误笔(本书页 224)。其实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已引用《大唐故兴圣寺主尼法澄塔铭》载有法澄俗姓孙氏,可能是错引《金石萃编》和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混淆法澄出身所致。^②

唐代稀见双语的安优婆姨塔铭,本书侧重汉文部分释读,先后针对塔铭文体、优婆姨意旨女居士即信女、安氏源出凉州姑臧的粟特人,定居于长安群贤坊等语词概念疏解,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再次揭示三阶教有普法、别法两种佛法,以及诸多慕三阶教创始者信行禅师而死后归葬于信行塔侧的现象,其中以女性优婆姨居多,而安优婆姨则是外族更为特殊,“迁柩于终南山大善知识林侧,起塔焉……遵遗命也”(页 232),此处所谓大善知识指的就是信行禅师,以致僧俗信众“小塔累累相比”,唐宋时谓之百塔(页 255—256)。本书征引刘淑芬研究指出如安优婆姨之流信女,景仰高僧善知识,往往死后采林葬而后起塔陪葬其塔侧,缘于“信仰佛教、寡居多年、独自抚养”等原因,因此寡居的孀妇也往往不祔葬(夫妻合葬)。李浩根据安优婆姨粟特文铭文,更发现其既非寡居也非无子女的特殊现象。^③关于夫妻不合葬的所谓次文化现象,陈弱水称之为“夫妻关系的超越”,理由往往是基于佛教信仰,譬如“吾业以清净,心无恋着,岂以诗人同穴

^①拙文《北魏前期文化的转折与肆应——以〈嘎仙洞石刻祝文〉〈南巡碑〉为线索》,韩国中国学会《国际中国学研究》12辑,2009,页 222—223 提及鲜卑石室祝文末尾注记“东作帅使念凿”,书法犷悍沉稳朴拙,出自军士之手,显然这位名字叫念的军吏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刻工。

^②刘淑芬:《石室瘗窟——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二》,《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 260—261。该文原刊《大陆杂志》98 卷 2 期,1999,误载法澄为萧瑀的伍女,古籍本反而一再错打为法灯。

^③本书页 261—264。详参刘淑芬:《林葬——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石室瘗窟——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二》,《中古的佛教与社会》,特别是页 209—211、219、224、229、242、264、272、279。

之言而忘老子各归之本?”^①刘淑芬更指出禁断情欲、守身清淨的关键缘由，譬如“吾奉清淨教，欲断诛业障。吾歿之后，必烬吾身”“归骸反真，合葬非古。与道而化，同穴何为？”“时人以生死同于衾穴，厚葬固于尸骨。吾早遇善缘，了知世幻。”^②林欣仪探讨佛教的女身观和妇女信仰，特别指出女人身秽，而三阶教主张“痴泥得生莲花”，所以墓志铭中经常强调清淨、洁、澄来表达信仰追求和自我认知，解脱方式之一是求转女身往生西方净土，可能也是夫妻使不同穴的症结。^③

本书最后披露西安新见两方回纥贵族墓志，一为移建勿，二为李秉义，前者为英义建功毗伽可汗^④姪子，后者为前述可汗的堂弟。李浩针对两方墓志与另三方已出回纥人墓志进行比较，探讨回纥改回鹘名称在德宗贞元四或五年、回纥人以质子身分旅居长安的葬地居所以及丧葬资费等问题。关于“留舍鸿胪”和“送终之饰”两制度现象（页 287），《大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典客署》条已有明文规定，如下“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

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若身亡，使主、副及第三等已上官奏闻。其丧事所须，所司量给”。^⑤

最后，由于笔者较为侧重家族社会史，所以不揣浅陋想针对本书揭发的两个问题提出两点管见，聊供参考。首先，隋末唐初薛世雄、薛万彻父子武将家族，已知其祖先从敦煌迁徙雍州咸阳，寓居关中，《隋书·薛世雄传》谓其本河东汾阴人，可能出自家状伪托，世雄父薛回曾任官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刺史，惟李浩所征引薛万彻弟万备、薛世雄兄弟贵珍等两方墓志，前者透露出万备祖父薛回曾担任北周泾州、扶州（今四川松潘县）总管。薛贵珍墓志则指出祖父薛宁任官敦煌太守，“因以家焉”，所以《旧唐书·薛万彻传》才称其为雍州咸阳人，“自敦煌徙焉”。由此可以看出，此支薛氏疑非关中郡姓河东薛氏南祖房（本书页 96、98、99、105、106、110），即使曾待过四川，与北魏时期谑称的“蜀薛”有所牵连，但似也不能相提并论视为正统的河东薛氏。^⑥

^①陈弱水：《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从景云二年〈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谈起》，《中华文史论丛》81辑，页 191–197，特别是页 194。

^②刘淑芬：《石室瘗窟——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二》，《中古的佛教与社会》，页 280–285。合葬非古之言，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万岁通天 004《大周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夫人琅耶郡君王氏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 350 也指出“况合葬非古，前圣格言”。拙文《唐代代北胡族家族的婚宦与门风——独孤氏、窦氏及长孙氏再探》，《中国历史文化新论—高明士教授八秩嵩寿文集》（台北：元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20），页 370 也注意及润州刺史王美畅妻长孙氏“深悟法门，舍离盖缠，超出爱网，以为合葬非宜，何必同坟？”因而遗命采石室瘗窟。

^③林欣仪：《舍秽归真：中古汉地佛教法灭观与妇女信仰》，台北：稻乡出版社，2008，页 270–279。

^④即登里可汗，详参卢勋等著：《隋唐民族史》，页 144–147。

^⑤唐代在制度和法律上对蕃客的生活关照与送终之饰，可参林麟瑄：《唐代蕃客的法律规范》《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天圣令论集（下）》，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页 394–403。

^⑥详参拙文《唐代河东薛氏门风再探》，《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台南：成功大学，1999；《薛仁贵与薛元超：唐代河东薛氏门风的两种典型》，《史学：传承与变迁（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班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1998；以及刘淑芬：《北魏时期的河东蜀薛》，《中国史学》第十一卷，2001，页 40–43。

其次，赵郡李氏汉中房李百药遗令迁厝关中，而未遵循安土重迁的传统归葬原籍河北^①，此为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所说中央化的士族变迁流动现象，或如韩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4），连带也导致祖茔地改变，李浩因此发想唐宋变革期的转型，并非如陈寅恪指出只能出现在安史之乱前后的中唐，而提早出现在唐初（页137、139、140、142、148）。晚近以来，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81期，2006）已质疑唐宋变革期学说的合理性，但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9），第一篇二及第三篇二，则越发有力诠释有关时代区分与唐宋变革的课题。

其实李百药遗命交代迁厝的个案并非孤证，笔者随手检阅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唐代前期即有多例，譬如龙朔017《大唐故司宗寺丞上骑都尉王君墓志铭并序》志主王植太原晋阳人，“因官徙宅”，今为京兆万年人，卒于会稽归葬于京城（页129）。仪凤002《唐右金吾郎将马君夫人敦煌令狐氏墓志铭》指出“即夫人家迹，非远先茔，□令归魂而无依也”，卒后葬于关中岐山（页230）。长寿002《大唐故邢州任县主簿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志主王挺其先太原人，乃考“因官徙业”，自北而南，始寓居于神都洛阳县，故今为洛阳人氏，卒后葬于洛阳（页320）。长寿005《大周故前尚方监兼检校司府少卿中山县开国伯王公

墓志铭并序》，志主王基并州太原人，唐因“徙官”，故又为洛州伊阙县人，卒后葬于洛阳北邙山（页323）。长寿006《唐故左卫刘府君墓志铭并序》，志主刘僧本河间郡人，五代祖“因官”关右，遇乱不归，故今为长安县人，卒后葬于长安（页324）。延载001《大周故河东柳府君墓志铭并序》，指出柳怀素夫人元氏随子任官山东，中途染病，权殡宋州，其后三子奉敕从雍州移贯属洛州洛阳县，“旧墓田先在始平，兄弟所移，□神都坟墓不可更依，旧所亦□形胜”，卒迁神改葬于洛阳（页331—332）。李浩本书（页51）也曾指出祖孝孙虽乡居河朔，今乃安厝关西。以上诸例显示出科举官僚化^②乃至中央化因而迁徙的现象，甚至也影响籍贯里居和葬地。余扶危、张剑主编，《洛阳出土墓志卒葬地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2002）胪列《大唐中兴弘农郡杨使君墓志铭文》，指出杨思玄其先华阴人，因官从居洛州，今为河南伊阙人，中宗神龙元年卒于私第，葬于洛阳邙山（页86），即其显例。孟繁峰、刘超英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前言”指出“即使以往的著录，可确定出土于河北的亦寥寥无几。……可见仕于唐的河北士族大姓，大部分已不归葬族茔。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变化”。而毛汉光或今堀诚二揭橥北朝末迄唐代前半期中央化或科举官僚化，导致人口迁徙萃居两京，特别是卒葬洛阳的人生归宿，此即李京《唐代的邙山认同研究》（郑州：郑州大

^①唐人小说《吴保安》中，郭仲翔为报恩亲身跣足步行千里，将吴保安夫妇遗骨归葬家乡河北的故事，可见一斑，至于人物与事件的真假，另参赖瑞和：《小说的正史化：以〈新唐书·吴保安传〉为例》，《唐史论丛》，2009。详细的案例可参考裴恒涛：《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②详参今堀诚二：《唐代士族の性格素描（二）》，《历史学研究》十一，1940，页46—47、56、72。

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所谓的邙山认同的现象。

职是之故,毛汉光认为几乎所有中古时期大士族在洛阳地区皆有坊所,且葬于洛阳地区,而有一部分落贯洛阳,无论是大士族或官宦之家,洛阳地区是当时人物荟聚之地。^①韩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页 11)援引《新唐书·李义传》“遗令薄葬,毋还乡里”关键史文,也指出有可能是科举(寄生)官僚的一时权厝暂厝之举(页 13)。所以李浩指出李百药遗令交待迁厝雍州“何齿之宿而意之新”(页 144)的创新思维,因而“捅破了士族保守性的窗子”(页 141),其实可能也是受了大环境中央化或科举官僚化的潮流影响所致,“利于便近”地卒后葬于雍州,此与唐宋变革期的“转型”提前之说,似尚有讨论余地。

总括而言,李浩虽然再三谦称本书是“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页 225)、“急用现学”,同时“作为一种自我测试和自我挑战”(“后记”页

296),也引用金启棕所言“颇有心为未来学者斩棘披荆,而无意与当代方家争光竞耀。盖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为愧,我致力处亦不必因人之不屑为羞”(“代前言”页 43–44),显然有意将本书定位为石刻学入门之阶,把金针度与人。诚如周伟洲指出将墓志作为新出史料进行录文、标点、考释、考证,是墓志研究的基础,本身就是史学分析、史学研究,而对墓志进行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即是墓志的史学分析,两者均有存在的价值。^②清朝同治年间朱士端于所著《宜禄堂收藏金石记》中,概括指出金石文字既可以考经籍史传、可以识冠服器用、可以补官爵姓氏、可以稽礼仪兵制、可以博佛书释典等等诸多裨益,所以“金石之功大矣哉”。^③由此观之,李浩经营本书的理想与实践,虽然局部深度与广度可再商榷,但瑕不掩瑜,已然开启了跨域石刻证史的新视野与新潮流。

(宋德熹: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台湾中国唐代学会原理事长)

①毛汉光:《唐代前半期居住洛阳姓望之分析》,嘉义:《国立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1996, 页 186–187, 以及 1994、1995 国科会两年期计划《唐代士族两京城坊居住地之研究》。

②周伟洲:《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 4。

③转引自毛汉光:《石刻分类与石刻集释》,《汉学研究》7 卷 2 期,1989,页 233。

“大视野解读”新材料

——李浩先生《摩石录》读后

卢燕新

《摩石录》是李浩先生继《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园林别业考录》等之后,奉献给学术界的又一部新著^①。全书以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为重点,收录其近年研究的九篇论文,分别是《新发现唐初乐律学家祖孝孙墓志释读》(下文称“《祖孝孙墓志释读》”)、《冯五娘墓志铭录文与释读》(下文称“《冯五娘墓志释读》”)、《新发现唐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下文称“《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以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下文称“《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新见李白姻亲宗氏夫人墓志考略》(下文称“《宗氏夫人墓志考》”)、《新发现唐代石刻名家邵建和墓志整理研究》(下文称“《邵建和墓志整理研究》”)、《新见唐代吐谷浑公主墓志的初步整理研究》(下文称“《吐谷浑公主墓志整理研究》”)、《新见唐代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释读》(下文称“《安优婆姨塔铭释读》”)、《西安新见两方回纥贵族墓志的初步考察》(下文称“《回纥墓志考察》”)。九篇论文,串珠荟萃,连牍成章。其特点,正如该书《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所说:“笔者最近有幸从坊间看到唐代史学家、文学家李百药墓志铭拓片……惜当时稿件送

达较晚,安排的栏目有字数限制,许多问题未能展开。笔者的思考亦拘于就事论事,未能从隋唐士族转型的大视野解读史料,对一些宏大论题进行回应……”^②论述中所云“大视野解读史料”,既介绍了释读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的志趣追求,也可以视为《摩石录》特点的总括。纵观《摩石录》,其解读“史料”,重点是新见墓志。全书以“大视野解读”新材料,条分缕析,会通文史,新见迭出,是李浩先生奉献给学术界的又一道盛宴。

一、“新材料安置”:机缘与积累的契合

新材料,是《摩石录》“大视野解读史料”的基础,也是全书最突出的特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批新材料被发现。以唐代为例,如《曲石精庐藏唐墓志》《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等,诸多新见石刻,可谓“井喷式”涌出。然而,在新材料面前,学术研究的兴奋点往往会因人而异。陈尚君先生《摩石录·序》说:“李浩教授本人是陕北靖边人,在古都西安学习工作超过四十年,于汉唐文化与文学用力甚勤,根柢亦好。他在本书所据墓志,完全来源于老友齐志先生主持的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我想到以

^①李浩著:《摩石录》,(台北)联经出版社,2020年。

^②《摩石录》,页124-126。

前曾经引用过的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当的地位……’（《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九三五年谱，原注）我不知道李浩教授是否关注过这段话，但他的工作，与前辈的倡导无疑是精神相通的。”^①陈先生这段述评，其中有两点：一是旧材料熟悉，二是新材料合理安置，这对理解《摩石录》极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新材料的获得，有可能是机缘。然而，释读发现新材料中的文化意义，却是长期研究积累的结果。

在熟悉旧材料基础上，捕获新材料中的信息，这一特点，从书中《祖孝孙墓志释读》等九篇文章中均可以看出。现以《冯五娘墓志释读》为例。文曰：“追溯冯五娘的郡望、世系、指出其出于冯弘之后……张说文中提及的长乐，与褚遂良文中提及的信都实即一地，即今河北冀州信都……长乐冯氏，是中古著名门阀家族，长乐郡望族。西汉左将军、光禄勋冯奉世之子宜乡侯冯参之后，为北燕皇室。西元四〇九年，冯跋建立北燕，北燕亡国后，冯弘孙女文明太后执掌北魏朝政数十年，冯氏出王爵数人，极度尊崇，冯氏家族成为北朝时期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②据摘引文字可以看出，《摩石录》研究冯五娘墓志，其关注重点之一是家族文化。对这一问题，李浩先生研究成果丰硕。如《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说：“家族制度或

宗族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家族的衍生变化虽然非常巨大，但在整个前现代社会中，草蛇灰线，仍具有其惯性，而其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包括文学）的影响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从学理上说，家族是一种血缘性组织，是血缘性纵贯轴的基元。”^③其《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增订本）也说：“唐代文学士族处于衍生变迁过程中。通过对‘文学士族’、‘清流’、‘衣冠’、‘四姓’、‘五姓’、‘七姓’、‘郡姓’等词语的梳理，可以观测出转型的士族与历史机运的盈虚消长。”^④由此可见，李浩先生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时间既久，见闻又深。尤其是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不仅包括文学文化，而且涉及历史典章、政治制度、伦理哲学等诸多层面。

因“旧材料很熟悉”，所以，面对新出土材料，很容易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当的地位”。阅读《冯五娘墓志释读》可以看出，其思路是，通过释读碑文，追溯冯五娘郡望，考定其世系及生平事迹。然而，这一研究，其关键点不仅仅是新材料，而是基于两方面旧材料的熟知：一是文。如张说《故括州刺史赠工部尚书冯公神道碑》。文谓“公讳昭泰，字遇圣，长乐人也”，冯昭泰为长乐人，“长乐”在哪里？近年整理本《张说集校注》等均未笺注^⑤，然而，这是研究冯五娘世系的关键资料。又如，作者翻检胡戟《珍稀墓志百品》^⑥，找到了《唐故鸭渌道行军副总管薛君（万备）墓志铭并序》（下文称“《薛

^①《摩石录》，页 13—14。

^②《摩石录》，页 92—93。

^③李浩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页 2—3。

^④李浩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 年，页 19。

^⑤张说撰，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 年，页 1229。

^⑥胡戟编：《珍稀墓志百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页 68。

万备墓志》),从中发现冯五娘第七子薛万备事迹等。二是史志、典章制度。如《冯五娘墓志铭》谓“其先信都人”,“信都”和“长乐”是什么关系?《摩石录》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七“河北道·冀州”载:“文帝黄初中,以邺为五都之一,始移冀州理信都。自石赵至慕容垂,或理邺,或理信都。苻坚用王猛为冀州牧,镇邺。后魏冀州亦理于邺,仍于信都为旧冀州之理,置长乐郡。隋开皇三年罢郡为冀州,大业三年复为信都郡。隋末陷贼,武德四年讨平窦建德,改为冀州。”^①这样,将“长乐”“信都”的变迁梳理清晰,冯五娘的郡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同时,通过《摩石录》研究冯五娘的例子,也应看到,该书“利用新材料”不仅仅是熟悉相关材料这么简单。书中通过对比新出《冯五娘墓志铭》与《大唐故太中大夫濮州刺史薛使君(万述)墓志铭》《薛万备墓志》分析“转型时期薛氏家族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指出:“可以看出,河东薛氏入唐以来,到了第三代,已经随俗雅化,与时俱进,由尚武而转为崇文。”^②这一问题,未发现新材料前,文作者已有研究。如其《唐关中士族与文学》第五章《唐代关中文学群体的构成》指出:“笔者通过对‘关中郡姓’命题的辨析已指出,柳、裴、薛三氏自魏周以来由倾向拥护武川系贵族,到最后加盟关陇集团,而其主支本贯亦先后徙入关中,不断失去其地方代表性,趋向

于官僚化、中央化。尤为重要的是,逐渐由一些武质的豪族,变成文化显族、文学世家。”^③其《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土族研究》第四章《唐代文学士族的地域构成》“河东薛氏”也指出:“薛氏以文学著名者,初唐有薛收。收为隋内侍郎薛道衡之子,尝受学于王通,长于言理,人称‘薛庄周’。收子元超,与上官仪文章款密,好汲引后进之士,故杨炯誉为‘朝右文宗’^④。薛稷为收从孙,魏徵外孙,多才多艺,工于书画,其书宗虞世南、褚遂良,其文被张说评为‘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⑤,其诗《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为初唐五古名篇,曾受到杜甫的称道^⑥。”^⑦由此可见,因此前的学术积淀,作者对家族转型、河东家族与关陇士族的文化交融等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这样,发现新材料,才能敏感地捕获其中文化价值。因此,《摩石录》释读冯五娘墓志,能从其中零星记载薛万述、薛万均、薛万徵等人事迹中,将河东薛氏家族转型时期特点的研究引向深入。

现再以《祖孝孙墓志释读》《邵建和墓志整理研究》为例。这两篇文章关注祖氏家族、礼泉邵氏房、中古家族史等,其所呈现的特点,盖同上文分析《摩石录》研究冯五娘墓志所论。如前篇文章论“关于祖孝孙的乐学与乐律学贡献”说:“也就是说,祖孝孙恢复古乐,从音乐表演的实践来看,超过了世代技艺相传的制氏。”^⑧后篇文章论“墓志

^①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页483。

^②《摩石录》,页110。

^③《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页114。

^④原著注:《杨炯集》卷三《王勃集序》。

^⑤原著注:《大唐新语》卷八《文章》。

^⑥原著注:《杜诗详注》卷一一《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土族研究》(增订本),页92—93。

^⑧《摩石录》,页76。

所记唐代刻石艺术家的资料”也说：“除了对邵建和兄弟在刻石艺术史上的成就进行评价外，墓志铭还提及：‘自唐以来则有朱静藏、史华、徐思忠、卫灵鹤、郑振、陈英、常无怨、杨暄等，皆异代同妙也。’这实际是一个简略的从初唐到邵建和时代石刻名家排行谱……”^①据摘引文字可以看出，前篇文章所论，涉及音乐史问题。后篇文章研究，则绘制出初唐到邵建和时代石刻艺术家排行谱。比较这两篇文章，其共同之处，是对唐代艺术家的关注。对比李浩先生此前研究成果，除《唐诗的美学阐释》，其《唐代园林别业考录》多有论述艺术家者，如前言所论：“就艺术特征而言，唐园之规划设计除皇家园林仍保持追求吞吐山川、体象天地的大制作外，士夫文人造园，更多地追求壶中天地的美学境界……唐园在叠山理水技术上亦有很大进步，已由过去单纯的垒土为山，变而出现了叠石为山，对假山的重视以及引河（泉）水入园池，设制飞瀑和潺湲声，更加普遍。”^②不难看出，这里不仅研讨园林艺术史，也论及唐园总貌及其特点，还论及不同园主对园林审美的不同心态。纵观《唐代园林别业考录》所论京兆府、河南道等诸地园主及园林，尤其是书中考录“阎立本西亭”“郑协律山亭”“陆浑山庐”“条山茅斋”“翠峰亭”“龙泓憩馆”“八角亭”“吴兴别业”“三癸亭”所考录者，不仅是唐代亭园堂馆等别业建筑艺术图谱，换个角度，园主如阎立本、郑协律、陆浑、颜真卿等，亦可以视为有唐代艺术家群体的汇录考察。由此可见，《摩石录》关注艺术家，也不是突发

奇想式的偶然所得。

《摩石录》中其他篇章，如《宗氏夫人墓志考》《回纥墓志考察》等，均可以在李浩先生既往的学术研究中找到前期积累的线索，可见，《摩石录》研究新材料，提出诸多新观点，其学术历程的漫长，只有入乎其内者方能知晓。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原注），那人正（当作“却”，原注）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③“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悔”“憔悴”云云，旨在强调学术研究要有长期辛苦积累的过程，在“在灯火阑珊处”，也就是偶然得之，是读书人喜见的结果。然而，《摩石录》偶然机缘所得，却是长期思考的结晶。

二、“大视野”释读：精思之后的突破

“大视野”，乃《摩石录》“大视野研究史料”的关键，是全书另一显著特点。无论是研究传世典籍，还是研读新见材料，视野都是非常关键的。因此，《摩石录》以研究新材料为主，强调“大视野”，具有非凡意义。对研究者而言，新材料是静态的。如何考察，往往会随着释读者的视野而不同。对于这一问题，《摩石录》“究天人之际”（代前言）说：“通过对墓志的考察整理，我认为有必要正面思考和关注古人对冥界的布置与经营，古人将他们在人间取得的文明成果用于对自己或祖先在

^①《摩石录》，页 190。

^②李浩著：《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页 3。

^③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16 年，页 16。

冥界安息之所的营构,同时竭力凿通对天界的想象和梦想,从广谱的交叉科学角度来进行挖掘和研究……”^①具体到研究内容,其概括为五个方面:生命伦理学、遗址景观学、丧葬人类学、图绘现象学、碑刻文献学。由此可见,《摩石录》“大视野”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纵横拓展。如《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这篇文章,是作者《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的续写及进一步拓展。其关注重点,是中古士族转型等问题。对中古时期士族的研究,相关成果很多,如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②、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③、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④、布目潮沨《唐初的贵族》等^⑤。但《摩石录》中,作者更多的是关注唐代士族的转型。然而,零星的记载,如果没有宽阔的视野审读,是很难有突破性发现的。如释读《李百药墓志铭》“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迁厝于雍州万年县少陵原”曰:“到了李百药,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迁厝于雍州万年县少陵原’。但是,他的‘迁厝’,究竟是暂厝,还是改迁新葬地?如是改迁新葬地,则象征家族新贯或迁徙新标杆的正式形成,于社会史与移民史研究就有另外一番象征意义了……可见,习惯上是将迁厝作为改迁归葬的替换词,与‘权厝’、‘暂厝’的用法还是有差别的。入唐以来,李氏汉中房支放置这一标竿的地点既不是饶

阳旧塋,也不是祖父母所居的邺城,或河南府的洛阳,而是京兆府长安,似有一种特别的意义。”^⑥墓志铭中的这句话,本是常见的归葬地及迁葬日期记叙,但是,《摩石录》却从这里发现了士族转型的大问题。

又如,上文所述,释读《祖孝孙墓志释读》,发现了“中古山东著姓的祖氏一支,在南北朝迄隋唐时期迁徙流动的一些潜转暗换的消息”^⑦。又如,研究《冯五娘墓志释读》,作者据志文零星记载冯五娘子薛万述等人事迹,作出“转型时期薛氏家族由尚武向崇文转变”的推论,等等。可见,研读新材料,以眼观六路的视野,可以从不起眼的文字中捕捉极具学术意义的信息。

有时,《摩石录》以“大视野”从新材料中捕获问题的功力不能不令人惊叹。如《宗氏夫人墓志考》,志文谓“父楚客,皇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弘文馆大学士、修国史、上柱国、郢国公,食封七百户”,这本是载述碑主世系的常规笔法,然而,《摩石录》却以“大”的视角,作了两方面颇有意义的挖掘与拓展:

一是宗楚客研究。文曰:“新文献可直接补宗楚客传者较少,但也还有些值得关注。如史传提及宗的出生地,未提及旧贯。另外,本墓志铭写于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距离景龙四年(七一〇)宗楚客伏诛已经过了二十九年,故墓志铭中对当

^①《摩石录》,页36。

^②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③谷川道雄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④毛汉光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⑤布目潮沨撰:《唐初的贵族》(《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

^⑥《摩石录》,页138—139。

^⑦《摩石录》,页56。

时的事件稍淡化,可以看出墓志铭对宗楚客的评价,与史传叙述差别较明显。”^①宗楚客,《旧唐书》卷九二《宗楚客传》曰:“韦氏败,楚客与晋卿等皆伏诛。”^②《新唐书》卷一〇九《宗楚客传》亦曰:“虽外附韦氏,而内畜逆谋,故卒以败。”^③研读这两处记载可知,两《唐书》本传均语焉未详,且略有贬斥意味。《摩石录》以“大”视野,关注到墓志与史志的毫厘差别,并由此推演其中原由,诚为可贵。

二是李白妻宗氏研究。李白妻女,较早记载见魏颢《李翰林集序》,然而集序谓“终娶于宋”,王琦注:“太白《窜夜郎留别宗十六璟》诗有‘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陆离。斩鳌翼娲皇,三人凤凰池’,‘令姊忝齐眉’等语,是其终娶者乃宗楚客之家也。而此云宋,盖是宗字之讹耳。”^④王注谓“终娶者乃宗楚客之家”,所娶者和宗楚客什么关系,却留有缺憾。《摩石录》研读宗氏夫人墓志铭,将研究视野宕开,追溯曰:“既然李堪妻宗氏是宗楚客的次女,那么长女应该嫁给了王某……又据前列宗氏简表知,李白妻宗氏为宗楚客孙女,那么应该是李堪妻宗氏的侄女,其弟宗璟是侄子,李白应该是他的侄女婿。为墓志书丹的王严、‘姊之二孤女’,与李白妻宗氏、宗璟是姑表关系。”^⑤这段考论,由李堪妻宗氏墓志拓展到李白,再联系李白诗,厘清李白、宗楚客、李堪、宗璟诸人的关系。可以说,以“大”的视野,将出土材料的价值最大限度地予以利用。

《摩石录》中,类似特点亦见于《吐谷浑公主墓志整理研究》等文章中,限于篇幅,不一一举例论述。

其次是深入发掘。墓志载述,因文体、石材等多方面原因,诸多信息,往往简要精炼。如前文引《大唐故中书省镌□□题玉简都勾当刻玉册官游击将军右威卫左郎将上柱国高平郡邵府君墓志铭并序》(下文称“《邵府君墓志铭》”),志文中有“凡景钟之铭,丰碑之烈……自唐来则有朱静藏、史华、徐思忠、卫灵鹤、郑振、陈英、常无怨、杨暄等,皆异代同妙也”数语,《摩石录》敏锐的洞察到这段文字的巨大意义,文中分析说:“这实际是一个简略的从初唐到邵建和时代石刻名家排行榜……”^⑥对《摩石录》而言,“排行榜”不仅是姓名信息。文作者沿着这一发现,从每一个点深入探索,把“排行榜”的文化意义挖掘到最深处,绘就一幅排行谱系图。其中,郑振、常无怨二人,曾毅公《石刻考工录》、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等均未著录。由此可见,《摩石录》研读《邵府君墓志铭》视野与深入探索的功力。

类似者,又如《吐谷浑公主墓志研究》。这篇文章研究《大唐兴圣寺尼成月公主□氏墓志》(简称“《成月公主志》”),为了考察唐与吐谷浑关系,与《弘化公主志》对读后,结合《册府元龟》等史典以及学界研究成果说:“关于弘化公主的研究,史学界较多关注的是唐朝与吐谷浑的关系,以及她在其中

^①《摩石录》,页 163。

^②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页 2973。

^③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页 4103。

^④李白撰,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 年,页 1451。

^⑤《摩石录》,页 169—170。

^⑥《摩石录》,页 190。

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还有些更基本的问题尚未能解决,如为何墓志提及她下嫁诺曷钵的时间与史传记载不一致?她与诺曷钵共有多少子嗣?她的长女名叫什么?为何要把次女成月公主送到长安入寺学法?”^①结合这段引文,对比该文相关论述,可以看出《摩石录》在深入研读新材料层面的特点:

一是对史志、碑文及学界研究成果的深度熟悉。如文中研究“弘化公主出降的时间”曰:“史传记载是贞观十四年(六四〇),《弘化公主墓志》则谓:‘以贞观十七年出降于青海国王勤(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杜光简和慕寿祺都疑史传有误……夏鼐则认为史传‘皆系根据当时实录,年月不应有误。志文出自后人,追记五六十年前之事,未暇深考,自易致误’,故倾向于贞观十四年(六四〇),周伟洲从夏鼐说。李颜恺则认为史书为后人撰写,墓志系当时的人撰写,墓志更可信。”^②可见,文中历述学界成果,如数家珍。正是缘于作者熟悉历史典籍以及学界研究现状,其才极有可能挖掘出历史疑案的焦点,为读者展示“旧视角”中有争议的问题。这样,“新视角”考察方式及其特点就自然凸显出来了。

二是穷尽新材料所蕴含的信息,发掘其文献价值。作者释读《成月公主志》,其重点是成月公主生平事迹,然而,作者由此进一步考察了唐与吐谷浑关系、唐代贵族女性崇佛现象。从文本中爬梳出这么多资料信息,已实属不易,然而,作者并未止步于此。在完成上述研究以后,又结合《唐

会要》卷四八、《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等,进一步研究了兴圣寺的政治文化地位:“兴圣寺在唐代前期的政治文化地位极其特殊:始为高祖潜龙旧地,高祖舍宅为宫,太宗钦改尼寺。玄宗亲幸,施钱修寺。可见此地与唐前期的宫廷政治有密切关系。”^③不难看出,作者关注的,已经超越成月公主与兴圣寺本身。最具有启迪意义的是,本文又研究了兴圣寺内的美术与建筑、兴圣寺内的《华严海藏变》等问题。可见,在新材料面前,学者可能有多种视角、多条研究路径、多个兴趣点。这一点,从《成月公主志》研究文末结论也能看出来:“成月公主所修习兴圣寺是一座尼寺,由唐高祖李渊的旧居改建,但与一般的尼寺似有较大区别,其地理位置在长安外郭城通义坊,距皇城、宫城较近,唐玄宗为太子时经常出于该寺,寺主尼法澄本身就曾是王妃,因罪被籍没,故与统治阶级高层的关系密切。”^④不难看出,新材料所蕴含的信息,往往是内在的。只有极具慧眼的研究者细读深挖,才能极大程度地使用其资料信息。

三、“解读”新材料:新观点发覆的功力与方法

《摩石录》以“大视野解读史料”,“解读”是“大视野”原则与“史料”文本之间的桥梁。然而,“解读”绝不是阅读那样简单。对此,何寄彭先生《摩石录·序》说:“盖金石之学,牵扯的知识太广,需要的涵养太深,李先生写来旁征博引,井然有见,虽初试啼声,功力已然不凡。”^⑤这里,何先生

^①《摩石录》,页213。

^②《摩石录》,页213。

^③《摩石录》,页221。

^④《摩石录》,页225—226。

^⑤《摩石录》,页5。

所说“旁征博引”、“功力”，指出了《摩石录》发覆新观点、取得成就的原因所在。

纵观《摩石录》，其研读墓志基本的法则是细读文本。这是研究者都熟悉的方法。然而，《摩石录》的“功力”，恰好有鉴于此。如《宗氏夫人墓志考》，文章在“墓志中一些语词概念的疏解”一节考释“兆自翼轸之郊，人居股肱之地”曰：“翼轸之郊，翼轸是二十八宿中的翼宿和轸宿。古为楚之分野。《史记·天官书》：‘翼轸，荆州。’荆州是古九州之一，翼轸之郊，应该是指宗氏的郡望南阳。股肱之地，当指河东。《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四上》：‘宗氏出自子姓。宋襄公母弟敷仕晋，孙伯宗为三卿所杀，子州犁奔楚，食采于钟离。州犁少子连，家于南阳，以王父字为氏，世居河东。’除与宗氏祖先的联系外，河东也是唐王朝及隋朝统治者的发迹之地，属于最基本的统治地区，故称。”^①这段文字，其方法有三点：一是训释法。如训释“翼轸”时谓“是二十八宿中的翼宿和轸宿”。二是溯源法。如据《新唐书·宰相世系四》研究宗氏姓氏及郡望。三是推论法。如据《史记·天官书》释“翼轸”的地理含义，得出“翼轸之郊，应该是指宗氏的郡望南阳”的结论。

又如《安优婆姨塔铭释读》第八小节“关于‘普别两种佛法’、‘一乘’等概念”，作者考释曰：“本塔铭中提及安优婆姨‘遂闻有普别两种仏法耳……为演一乘之妙理，启凡俗之迷心，誓毕三祇，当阐正法’云云。‘仏’即‘佛’的异体字，‘普别两种佛法’的说法来源于隋代信行(五四〇—五

九四)所创立的三阶教。三阶教将佛法分为普法和别法。所谓普法，即于法不分大小，于人不辨圣凡，普信普敬，不尊此法而斥他法，所以名为‘普’。换言之，是指对法不分大、小乘，于人不辨圣、凡，普信普敬，这是第三阶众生最适合修行的方法。所谓别法，是分别大小乘法和圣贤凡夫，所以名为‘别’。”^②隋代僧人信行，《开元释教录》卷一八《别录》有记载：“《三阶法》及杂集录，总三十五部四十四卷，隋真寂寺沙门信行撰”，注曰：“《长房录》云总三十五卷，《内典录》中都四十卷，《大周·伪录》但载二十二部二十九卷，并收不尽。其《三阶与教碑》云四余卷，而不别列部卷篇目，今细搜括，具件如上。”^③据引文可以看出，《摩石录》释读志文，先从文字入手，再用训诂法解释“普”“别”。为了深入、准确、清晰地研读碑志，作者又采用了溯源法，探讨信行及其三阶教，再用阐释概念法分析“普法”“别法”，又用对比法分析二者的不同特点。可见，阅读文本时，文作者调用一切适合识读的方法，溯源逐流，条分缕析，即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以“功力已然不凡”评论，由此可略见一斑。

观《摩石录》全书，其研究方法灵活，一一举隅分析，实属不易。暂列举以下五种，实乃读后浅见：

第一，考据法。考据法是全书常用的方法。如《祖孝孙墓志释读》考证修订雅乐时间：“按，关于修订雅乐的时间，一说‘七年修订雅乐’，另一说‘九年定乐’，究竟是何者为是呢？吉联抗先生似

^①《摩石录》，页155—156。

^②《摩石录》，页252。

^③智升编，罗凌校注：《开元释教录》，崇文书局，2016年，页419。

已经注意到这个差异,他指出《资治通鉴》先在武德九年说:‘春,正月,己亥,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唐纪七》)后在贞观二年说:‘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唐纪八》)据此,他推断高祖李渊命祖孝孙制定雅乐,当在武德九年春,其完成则在两年以后,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年六月。检《唐会要》卷三二《雅乐上》,修订雅乐的起讫时间年月俱全,惜这条材料似乎被学界忽略了,特补入。”^①祖孝孙修订雅乐,事见《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武德九年,始命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奏之。”^②《新唐书》卷二一《音乐志》所载略同。《唐会要》卷三二“雅乐上”:“武德九年正月十日,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考正雅乐。贞观二年六月十日,乐成,奏之。”^③可见,《唐会要》与两《唐书》甚合,且恰如《摩石录》所言“起讫时间年月俱全”。可见,《摩石录》用考据法,首先是对学术问题的高度关注,在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找到关键点。其次是旁征博引,找到解决问题的佐证材料。这样,考据结论就有较强的说服力。类似例子,又如书中考证冯五娘家世、考证宗氏夫人世系、考证邵建和家族及其世系等。

第二,文史互证法。文史互证,也是本书常用的方法。如《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考释李百药的生卒年等:“关于李百药的生卒年及年龄问题,《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谥曰康。’又《新唐书》卷一〇二《李百药传》:‘卒年八十四,谥曰康。’此后,有关李百药

生卒及年龄皆以此为出处,虽然《谭宾录》及《唐诗纪事》记百药卒年八十五岁,惜后人多斥其不知所据,未予采录。今案《墓志铭》:‘贞观廿二年二月廿六日寝疾,薨于京师胜业里第,春秋八十五。……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迁厝于雍州万年县少陵原,礼也。’卒时卒地及葬时葬地都非常具体明确,其卒时为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卒八十五岁。以此推算,其生年为北齐武成帝高湛河清三年(五六四)。”^④由此可见,作者以新出墓志记载,考证两《唐书》之非,凿实《谭宾录》等记载李百药享年,并为之提供佐证。在援引材料时,作者不仅关注正史典籍,野史笔记以及子部著述等,凡能引以为证者,尽皆搜蒐,汇于文中。证据翔实,结论有据。类似例子,又如将《冯五娘墓志铭》与《隋书·薛世雄传》《旧唐书·薛万徹传》互证研究冯五娘生平及其子嗣,以《李百药墓志铭》与两《唐书·李百药传》《通典·职官三》以及《唐诗纪事》卷四“李百药条”、《大唐新语》卷八“文章”、《全唐诗》录李百药诗、《全唐文》录李百药文互证研究李百药生平及其诗文活动等。

第三,比较法。比较法也是全书常见的研究方法。如《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李百药墓志铭》与其祖父母墓志的对读”:“一是李敬族与其妻赵氏均与北魏大儒徐遵明过从甚密,互相揄扬。《李敬族墓志》:‘时燕赵数乱,坟素无遗,公家有旧书,学又精博,大儒徐遵明闻而远至,呼泡之侧,别构精庐,共业同心,声猷俱盛。’《赵氏(兰

^①《摩石录》,页 61。

^②《旧唐书》,页 1040–1041。

^③王溥撰:《唐会要》,中华书局,1957 年,页 588。

^④《摩石录》,页 119–120。

姿)墓志》:‘圣哲遗旨,又多启发,大儒徐遵明时在宾馆,具相知委,尝谓学者云:夫人是内德之师。’案徐遵明是北魏后期北方的大儒,《魏书》和《北史》有传。李敬族夫妇墓的志文均由其子李德林所撰,故两方志的内容互相呼应,似难免有拉名人以表彰其父母的嫌疑。但是至少透露出李氏家族与当时河北学界的闻人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①由此可以管窥,《摩石录》比较的特点:首先,选择合适的比较对象,对比研读。其次,在研读材料的基础上,征引史志等典籍,找出其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仔细比较基础上,得出合理结论。类似例子,又如书中将《冯五娘墓志》所记薛世雄家族与已有文献对读、《回纥墓志考察》将两方新见墓志比较等。

第四,归纳法。《摩石录》中常见归纳推论法。书中所收录的九篇文章,每篇文章末尾均有本文的初步结论与推论。除此以外,该书在研究每一问题时,均有材料→释读分析→归纳结论这一特色。如《冯五娘墓志释读》研究冯五娘子嗣说:“前引《隋书·薛世雄传》五娘及薛世雄所生四子:万述、万淑、万钩、万徵。《冯五娘墓志铭》则述及世子万述、第五子万钩、第六子万徵、第七子万备。也就是说,薛世雄与冯五娘至少有七个儿子。”^②很明显,作者研究冯五娘之子,将《隋书·薛世雄传》所见与新见墓志结合,简要明洁的归纳出结论。又如《吐谷浑公主墓志研究》说:“唐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好坏亲疏不一,吐谷浑与唐的关系

比较亲近,除了祖先与鲜卑民族有共同关系外,恐怕包括弘化公主等人在内都作了不少切实的贡献,这样既消除了唐政府的心腹之患,也延续了吐谷浑的存在。”^③对比前文可知,这一结论是在与《弘化公主志》对读、考察唐与吐谷浑关系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

第五,诠释法。如《安优婆姨塔铭释读》诠释“优婆姨”:“优婆姨”,即‘优婆夷’,梵语为 Upāsikā,又译为优婆私柯、优婆斯、优波赐迦、邬婆斯迦、邬波斯迦、优波赐迦等。《玄应音义》二十一曰:‘邬波斯迦,或言优波赐迦,此云尽善女,言优婆夷者,讹也。’中译为女居士、居士女、清静女、清信女、近善女、近事女、近宿女、信女等。慧琳《音义》十三曰:‘邬波斯迦,唐言近善女,或言近事女。’……即在俗之信女。也就是亲近三宝、接受三归、施行三法的在家女子,为在家二众、四众,或七众之一。如能受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称持戒优婆夷。对应的男性为优婆塞,四众或七众之一,又可称为居士。”^④可见,《摩石录》诠释名称,既音释,也义训,引经据典,精要阐释。书中例子,又如《祖孝孙墓志释读》对“杜生”“制氏”“奏升平之颂”的诠释、《宗氏夫人墓志考》对“汉广”“南纪”“翼轸”“西陵”的训释等。

除上文所叙,《摩石录》研究方法多样,如在研究《冯五娘墓志》《李百药墓志》《成月公主志》《吐谷浑公主墓志研究》用图表法,《吐谷浑公主

^①《摩石录》,页 134。

^②《摩石录》,页 99。

^③《摩石录》,页 214。

^④《摩石录》,页 240。

墓志研究》文中研究唐代贵族女性崇佛现象、《李百药墓志》中的葬地改变看汉中房支的转型用推理法,等等。有时,探讨一个问题,作者运用多种方法,如研究“文献中的李白妻宗氏”,作者用了考据、文史互证、归纳、演绎推理、例证等多种方法。要之,多样化、且精准合适的研究方法,也是《摩石录》取得成功的关键。

不过,《摩石录》在文献、文字层面有些尚未尽善尽美的地方,主要有三点:

第一,引文标注问题。如第八十三页刘观《太乐令壁记》,注云引自《玉海》卷七,然而,《玉海》的年版、页码均失注。又如第九十三页引《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七“河北道·冀州”,引文标点“苻坚用王猛为冀州牧镇邺,后魏冀州亦理于邺”,而贺次君点校本标点为“苻坚用王猛为冀州牧,镇邺。后魏冀州亦理于邺”^①。类似者,又如第一四二页引胡震亨《唐音癸签》、第二二二页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因为引文没有注明出处,文字、标点正误与否,读者就无法考实。

第二,引用典籍问题。如第九十二页引张说《故括州刺史赠工部尚书冯公神道碑》,注谓引于《全唐文》卷二二九《张说》九。然而,该文见于《四

部丛刊》本《张说之文集》卷二五^②,又见于《四库全书》本《张燕公集》卷二一^③,亦见于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二五^④,也见于《文苑英华》卷九二一^⑤。又如第二五四页引慧净《杂言》,注谓引自《全唐诗》卷八〇八。然,本卷重出,又作义净诗,题为《与无行禅师同游鹫岭瞻奉既讫遐眺乡关无任殷忧聊述所怀为杂言诗》^⑥。实际上,这首亦见于明冯惟讷《古诗纪》卷一三八,题慧净《杂言》。

第三,文字及标点校对。如第九十六页引《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薛世雄,字世英,本河东汾阴人也,其先寓居关中。”注为引自中华书局一九七三年点校本,然,查该年版《隋书·薛世雄传》,标点为:“薛世雄字世英,本河东汾阴人也,其先寓居关中。”又如,第一五七页引宗楚客传,文谓“《新唐书》卷一二二《宗楚客传》”,当为“《新唐书》卷一〇九《宗楚客传》”。

当然,兹所列举三点小问题,乃《摩石录》碧玉微瑕。该书的“功力”,正如陈尚君先生《摩石录·序二》所说“言之成说,多有发明,在唐石研究中可自成家数”,诚当中肯之论。

(卢燕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元和郡县图志》,页483。

^②张说撰:《张说之文集》,《四部从刊》本,页10。

^③张说撰:《张燕公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188。

^④张说撰,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页1229。

^⑤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影印本),中华书局,1966年,页4849上。

^⑥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页9118。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西北地区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重要阵地。20世纪50年代，西北大学始建马列主义教研室，90年代更名为马列主义教研部，2009年正式改制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18年组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并获批成为陕西省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院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形式与政策教研部等6个教研部，获批成立陕西省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陕西省西北大学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基础理论重点研究基地、陕西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等4个科研平台。

陕西省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前身为成立于1998年的西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2007年改为西北大

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7年被确定为陕西省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围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为无行政级别实体研究机构，长期致力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等主要研究领域，形成了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新闻、外语等多学科人才配置和稳定、专业、优质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出版“延安时代与延安精神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等成果10余部，其中《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等10余项，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陕西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于2017年由陕西省高等教育工作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围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大学生宗教信仰现状、规律和趋势，特别是西部地区大学生及青少年宗教信仰等问题展开研究，为推动西部高校马克思主义宗教信仰教育及陕西高校抵御防范宗教渗透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先后在各类

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40 余篇，承担上级各类科研项目 10 余项，完成调研报告 10 余篇，成果先后被中央统战部、中国社科院、中央来陕巡视组、陕西省委统战部、陕西省教工委、“新华社内参”报送中央领导等所采用。

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重点研究基地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2020 年批准成立。基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在思想政治基础理论及其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一般项目和西部项目、省部级科学硏究项目 50 余项。围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逻辑研究、延安精神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陕西省思想政治学习宣传和实践等研究方向，出版学术专著 20 余部，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0 余篇。基地现已建设成为西部地区思想政治

工作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研究的重要平台。学院学科体系齐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现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 4 个二级学科培养方向，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位授权点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较快发展。现有博士生导师 18 位、硕士生导师 25 位。目前已形成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的培养优势与教育特色。

近五年来，我院博硕士研究生研究成果丰硕，学术交流活跃。研究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思想政治理论导刊等权威、核心报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奖



项,多项研究成果获省级领导批示推广。通过常态化的线上、线下方式主办和参与国内外专家讲座、国内学术论坛、学术竞赛和学术会议,积极参加了全国青年博士论坛、陕西省社科界“陕西追赶超越新实践”理论研讨会、全国青年学术论坛、陕西省社科届“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七十年发展”理论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我院博硕士研究生在社会服务和教学实践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在导师带领下,分别赴全国多地进行社会实践、教学实践及调研活动,以社会调研、下乡教学、理论宣讲、会议精神解析传达等方式进行理论学习和运用,大大提升了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术热情。

学院持续加大培养过程管理,博硕士毕业生率不断提升。近五年来,累计有 29 人获得博士学位、210 人获得硕士学位。毕业生以其优秀的政治素养、过硬的业务能力、良好的道德风貌活跃在祖国建设的各行各业,其理论创新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受到了

社会的高度肯定。

学院坚持人才强院战略,逐渐形成了一支政治信念坚定、教学科研素质过硬、发展态势良好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 60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17 人、副高级职称 24 人,现有陕西省教学名师 1 人、陕西省青年杰出人才 1 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年度影响力人物 2 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 2 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骨干 1 人、全国高校网络教育名师培育支持计划入选者 1 人、陕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标兵、教学能手 10 余人。学院还聘请了一批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和学生工作干部为思政课兼职教师。

新时代,学院全体师生将秉承“公诚勤朴”的校训,发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西大精神,与时俱进、锐意改革,不断提升学院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水平,努力将学院打造成为西部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理论宣传和人才培养的坚强阵地。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梁星亮



梁星亮，1954年5月生，陕西大荔人，中共党员。1976年8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先后在中文系、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应用社会科学系、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2000年晋升为教授。2006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2017年聘为二级教授岗位。现任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院长、西北大学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西北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近十年来，梁星亮教授先后兼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及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委讲师团特聘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陕西

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陕西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会会长等。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史研究”（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制度建设研究”（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编年史（十三卷本）”（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2016年）等各类项目16项。

梁星亮教授从事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学研究工作45年，出版《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共中央在延安群众工作史》《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陕甘宁边区史纲》等专著15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和《新华文摘》摘编观点。进入新世纪，先后主编“延安时代与延安精神丛书”（10卷本）、《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人物传》（10卷本）、《陕西近现代名人录》（4卷本）等，由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陕甘宁边区史纲》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先后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陕西省教学名师、西北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和跨世纪人才等

20余次。

梁星亮教授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和延安精神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研究领域: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研究。其重要研究成果《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总体把握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即:从延安十三年的奋斗发展史,认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怎样从西北一隅走向胜利,走向全国;从延安十三年的理论创新史,认识全党怎样从理论准备不足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的发展变化,认识中共领导集体怎样从不成熟和不稳定到成熟和稳定;从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认识中国共产党怎样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该成果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历史中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如西北苏区错误“肃反”及处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利、皖南事变及其善后处理、审干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纠“左”等重大问题,亦客观公正地给以总结和阐释。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研究。其重要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研究》,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史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革命根据地治国、理政、安民的历史进程、基本成就、历史经验及其规律。以宏观而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基本国情、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构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为

未来建立新型国家奠定了基础。以微观而言,既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环境与区域、理念与制度、体制与机制、方略与方式、政府与民众、队伍与能力等予以全面考察,也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宏大纪事与历史细节、上层决策与下层互动、文献阐释与民众话语等予以整体关注,呈现立体、动态的历史画卷。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其重要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认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辉煌时期之一,思想文化的新觉醒、理论创造的新成果、文化建设的新成就,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史上谱写了璀璨夺目的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影响极大,但延安文化却在困境中奇迹般地成长、繁荣、发展起来,延安不仅由一隅小城而成为中国的另一文化中心,而且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文化体系。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直接促进了人民群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也直接促进了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

十多年来,梁星亮教授积极参与资政建言与社会服务工作。2008年11月、2019年8月,曾两次受邀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做《弘扬延安精神,推动科学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与历史经验》的专题讲座,受到与会领导好评。2019年4月,受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托,主持“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研究”课题,其最终成果为省人大领导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做专题讲座,产生了良好反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杨洪



杨洪，1960年3月生，陕西西安人，汉族，中共党员，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年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至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任教，1999年7月调入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马列主义教研部）工作，2000年评聘为副教授，2002年遴选为西北大学第四批跨世纪人才，2007年评聘为教授。曾先后担任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院长。兼任陕西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社会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陕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

杨洪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与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西北近代经济

史等专业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研究”和“西北近代经济史”两个专业研究领域。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研究

杨洪教授在该领域的第一个关注点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史研究。他在全面系统研究和梳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运用史料，拓宽和加深了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内容的研究，从整体上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延安时期实现了由弱小发展到强大的历史进程。他主编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2011年）获西安市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陕甘宁边区著名人物》（2009年）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陕甘宁边区史纲》（2014年）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二届陕西优秀图书奖；2018年参编的《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015年出版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群众工作史）》（副主编）。

杨洪教授主持的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陕甘宁边区史研究》（2009年立项），该项目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陕甘宁边区史研究领域，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规律、特点及各项成就。他发表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传播进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2期）一文，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

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对新文化建设的引领和渗透,在新文化建构的多重路径中,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和使命,该文获2016年陕西省党史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此外,他还发表了《延安时期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6期)、《论延安精神的民主意蕴与当代价值》(《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1期)、《延安时期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西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等论文。

杨洪教授在该领域的第二个关注点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与陕甘宁边区社会文化研究。他将侧重点放在了延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好文化理论创新工作的研究上,提出了较为新颖的学术观点。他主持的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延安时期文化社团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2016年立项),从延安时期文化社团建设的视角出发,深化和拓展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领域,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提出了新的认识和看法。他发表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大众化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9期)一文,系统分析和总结了延安时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学者群体、研究成果、具体特征和途径目标等关键要素,对于理清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大众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他还发表了《延安时期文化社团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西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陕甘宁边区建构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与启示》(《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延安

整风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7期)等论文。

二、西北近代经济史研究

杨洪教授对近代以来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艰难历程、主要成就、规律及特点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析,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在《陕西近代农业科技发展及影响探析》(《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中,他运用分析对比的方法,对陕西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阶段、农业科技发展的突出成就及具体特点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总结。《论国民党政府开发西北的政策与陕西近代农业的发展》(《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则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开发西北的方针政策以及当时陕西地方政府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对促进陕西农业经济较快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阐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工业改革探析》(《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一文,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工业迅速发展及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公营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思路、具体举措,进而有效提高了边区公营工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了边区公营工业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

杨洪教授还针对西北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进步的紧密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交通建设严重滞后是导致西北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的观点。他先后参编的相关著作有《历史与希望—西北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20世纪陕西经济结构研究》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有《试论西北近代交通建设》、《试论陕西近代交通建设及历史作用》、《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公路运输管理》等。

新书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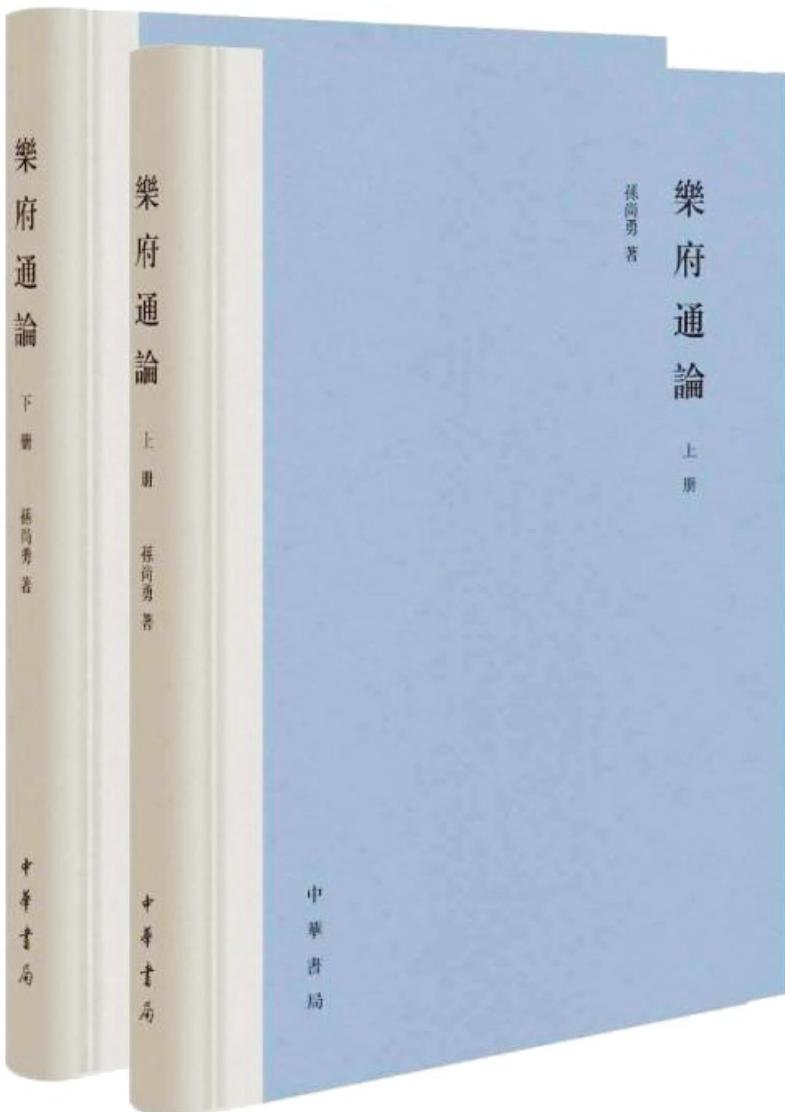
◆《乐府通论》

四川大学教授孙尚勇的《乐府通论》2020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孙尚勇是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研究中心杜甫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杜甫学会理事。主要学术领域为先秦汉唐文学、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和佛教文学。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专著《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佛教经典诗学研究》等。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

《乐府通论》一书是对汉武帝始创的乐府机构以及由此而演生之乐府艺术、文学、诗学和文献等的综合研究，注重考察礼乐仪式、表演艺术和文人乐府创作的历史迁变，以及仪式、艺术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努力揭示乐府对中古以降古代礼乐政治和文学艺术等的重要影响。该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17ZDA241)阶段性成果，全书十三章，分别为“绪论”“乐府本体论”

“乐府艺术论”“乐府文学论”“乐府民俗宗教论”“乐府审美接受论”“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论”“隋乐府论”“唐乐府论”“宋元明清古乐府论”“乐府诗学论”“乐府文献论”“总论”，对乐府文学发展演变史展开综合考察研究。



◆《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困境与解决之道》

西北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王晨佳副教授的新作《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困境与解决之道》一书 2020 年 12 月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王晨佳系教育管理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她的研究方向主要为跨文化沟通管理、文化产业、国际分工等，已出版专著《谈判学》，在《人文杂志》《中国出版》《西北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持参与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

作者多年以来持续关注西部地区的国际分工，为本书注入了深厚的实践素材和分析论据。全书分为八章，主要内容为：国际分工理论变迁和研究现状，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历史发展、宏观环境、微观环境和优势劣势的分析，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特征、本质属性及效应分析，西部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国际分工的比较分析，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实证分析以及促进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对策和建议等。她以大

量详实的数据资料验证了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特点及难点，始于资源导向、政策导向，囿于产权界定模糊、制度变迁困难、交易成本高等，从文化、地域、政治等跨学科角度深入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

